

高 教 动 态

总第 22 期 2012 年第 3 期

嘉兴学院发展规划处 主办

2012 年 10 月 20 日

本 期 要 目

● 高教动态

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正式颁布实施 1

中国论文数量世界第二质量堪忧 35%以上从未被引用 2

美国一流高校进入“大换血”时代	4
-----------------------	---

美国学术协会：先进大学的思想聚集地	7
-------------------------	---

● 学术前沿

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自主性	9
--------------------------	---

影响高校办学的四个因素分析	15
---------------------	----

国外开放课程对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的启示	20
------------------------------	----

● 校长著述

专访剑桥大学校长	26
----------------	----

希伯来大学副校长阿肯：科学家是创新的灵魂	32
----------------------------	----

中国人大校长陈雨露：校庆应回归大学育人本职	34
-----------------------------	----

“根叔”谈华科大未来：让学术自由成为永恒追求	37
------------------------------	----

● 专家观点

纪念钱伟长诞辰百年：放弃科研办教育是值得的	39
-----------------------------	----

杨福家院士：中国高等教育须力戒浮躁	41
-------------------------	----

熊丙奇：南科大不要成为“舌尖上的南科大”	43
----------------------------	----

● 高教动态

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正式颁布实施

历经两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已于近日正式颁布实施。从 2013 年起，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招生工作将按新目录执行。此次专业目录修订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

专业划分：更加规范合理

新《专业目录》仍然按照学科门类、专业类和专业三个层次进行划分，学科门类由原来的 11 个增加到 12 个，新增加艺术学门类；专业类由原来的 73 个增加到 92 个；专业由原来的 635 种调减到 506 种。

新《专业目录》在保留一批学科基础比较成熟、社会需求相对稳定、布点数量相对较多、继承性较好的专业基础上，主要调整了一批内涵不够清晰，名称不够规范，区分度较小的专业。例如，将“生物工程”、“生物系统工程”和“轻工生物技术”专业合并为“生物工程”。同时撤销了林木生产教育等 12 个无布点专业。

新《专业目录》还根据行业和学科发展，对部分专业门类进行了拆分、更名，例如专业类种的经济学类拆分为经济学类、财政学类、金融学类和经济与贸易类；图书档案学类更名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此外，新《专业目录》增设了一批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和改善民生急需以及应用性强、行业针对性强的新专业。例如，根据当前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安全运营需要，新增了“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据介绍，此次专业目录建构坚持“以宽为主、宽窄并存”的原则，调整后的 12 个学科门类与研究生学科门类完全一致，专业类与研究生专业一级学科基本一致。

专业结构：利于动态调整

本次专业目录修订的另一大突出特点是专业目录结构的优化，首次区分基本专业和特设专业。在新目录中，共有基本专业 352 个，特设专业 154 个。

所谓基本专业，是指学科基础比较成熟、社会需求相对稳定、布点数量相对较多、继承性较好的专业；而特设专业则是针对不同高校办学特色，或适应近年来人才培养特殊需求设置的专业。这是新版《专业目录》与前三版《专业目录》只设单一性质专业的最大区别。

本科专业目录修订综合组组长、上海交通大学原副校长叶取源告诉记者，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

为了既保证专业目录的完整统一，又有利于专业的动态调整，增强适应性。

今后，《专业目录》将每 10 年修订一次，基本专业每 5 年调整一次，特设专业每年向社会公布，每年批准设置的新专业均列为特设专业。此举为高校根据办学需要适时调整专业提供了机制保障，也有利于规范办学。

专业设置：高校获得自主权

此次，教育部在落实与扩大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上迈出了重大步伐。按照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高校可以根据专业目录自行设置本科专业，也可以申请设置尚未列入目录的新专业。

新《规定》首次对高校专业设置实行备案和审批两种制度。今后，只有设置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才需要经过教育部审批。而设置《专业目录》内除国家控制布点以外的 400 多种专业，均无需审批，而是采取备案的方式。

在“放权”的同时，新《规定》加强了对专业设置的宏观监管，具体措施包括：实行高校设置专业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信息服务与管理平台；建立高校、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部三级专业设置专家评议和监督组织，对于新设专业，进行年度检查、发布年度质量报告；对办学质量低下的专业实行限期整改、暂停招生等退出机制；建立专业设置预警机制，对于过度设置和涉及国家安全等特殊需要的专业实施国家调控。

教育部提出，各高校要依据新《专业目录》和新《规定》，做好学校新旧专业的对应调整，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转变观念、改变管理方式，从重审批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重指导、强服务的间接管理，同时建立健全专业评估监督体系。

《中国教育报》2012 年 10 月 12 日第 1 版

中国论文数量世界第二质量堪忧

35%以上从未被引用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获悉，在中国发表的所有论文中，有 35% 以上是零被引论文，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论文从未被引用过。对此有专家表示，中国科研已经“脱贫”，却还未“致富”，学术论文要想在国际上更有影响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数量第二但差距悬殊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1 年底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10 年我国发表 SCI 论文 12.75 万篇(含港澳地区),排在世界第 2 位,但与美国同期 SCI 论文数量相差很大,中国的 SCI 论文数量在短期内不可能超过美国。

在科学界,“SCI”是一个耳熟能详牵动人心的名词,它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最主要检索工具,一个国家在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及这些论文的被引用次数,通常根据 SCI 即《科学引文索引》来统计,是反映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反映着该国科学研究的质量或影响。

据统计,截至 2011 年 11 月,中国热点论文数量为 196 篇,占世界热点论文总数的 9.9%,居世界第 5 位,比 2010 年上升 1 位,但热点论文排名第一的美国,其数量达到 1070 篇。2011 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平均被引用 6.21 次,比上年度提高 5.8%,而当年世界平均值为 10.71 次,比上年度提高 1.3%。在这一评定标准上,中国只居于中流。

《科学》拒稿率达 98%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武夷山介绍,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仍较低,在中国发表的所有论文中,有 35%以上是零被引论文,也就是说,这些论文从未被引用过 1 次。

英国自然出版集团执行主编 Veronique Kiermer 和美国《科学》杂志亚太分社主编 Richard Stone 在访问中国时都谈到,中国学者在国际权威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发表量近年来呈现激增趋势,但优秀的论文凤毛麟角。Richard Stone 说,《科学》杂志对论文质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只有拥有真正价值,并在某些领域改变人们思想的科研论文才会被发表,其中瑞士的用稿率最高,而中国论文的拒稿率非常高,为 98%。

人才选拔模式是内因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曾多次“炮轰”过我国科技论文现状,他认为,论文数量与质量没有同步,两者之差越大,问题也越大,中国当前科学基础不够坚实,发展水平低于世界先进、低于历史纪录、低于经费增长、低于公众需求的水平。

饶毅说,若论重要论文,中国目前可能还不及上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当时他在海外求学,日本科学家已取得了 4 至 6 个诺奖级的成果,而中国诺奖级的成果要追溯到几十年前青蒿素这样的原创成果,就生命科学而言,中国目前的科研地位大约相当于 1910 年左右美国在全球所处的地位。

有专家认为,我国科研数量增长的背后是一种唯论文是举的人才选拔模式,北京大学吴明教授表示,搞研究需要“十年磨一剑”,但现行的评估体系下,只能用论文数量来评估,这种生硬的评估体系,也造成了人们对论文的追逐,甚至不惜造假,片面地追求数量最终影响到质量,“你天天拼

命地写论文，成果还没出来就急于发表，导致这浮躁的习气日益盛行。”

北京晚报 2012 年 10 月 11 日

美国一流高校进入“大换血”时代

随着四所常青藤盟校更换掌门人，美国一流高校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与国内高校的换帅风潮相比，美国一流高校“大换血”有着什么样的异同？其间，又有哪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呢？

八所常青藤盟校四所换帅

9 月 22 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宣布，提尔曼在担任了 11 年校长之后，将于本学年年末时卸任。这已经是美国八所顶尖高校——常青藤盟校中的第四位校长在本年度从校长位置上退了下来。

第三位是耶鲁大学校长。今年 8 月 30 日，在耶鲁担任校长长达 20 年之久的列文宣布，将于本学年年底辞去校长职务，这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引起了较大的震动。

但实际上，不大为人所知的是，早在这两位卸任之前，已经有两所常青藤盟校完成了校长人选的新老交替。

最先发生变化的是布朗大学。2011 年 9 月 15 日，该校校长西蒙斯宣布将于学年结束后辞职。

今年 3 月 2 日，布朗大学宣布，由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帕克森出任布朗大学校长。而就在布朗大学宣布新校长人选不久后的 3 月 23 日，达特茅斯学院的校长金勇被美国政府提名出任世界银行行长。这位在达特茅斯任职不足四年的校长，就这样被联邦政府作为人才给“挖走”了。很快，达特茅斯学院董事会宣布，该校知名教授、前任教务长、生命科学家佛尔特女士将出任该校校长。

四位校长无不具有“第一”称号

上述四位校长，头顶上都挂着一个甚至多个“第一”的称号。

列文 1993 年出任耶鲁大学校长。到目前为止，他不仅是八所常青藤盟校校长当中资格最老的，也是拥有 61 所一流大学（59 所美国一流大学、2 所加拿大大学）的组织——“美国大学协会”（简称 AAU）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西蒙斯是一位非裔美国人，2001 年出任布朗大学第 18 任校长时，是“常青藤盟校”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女校长。实际上，在她担任布朗大学校长之前，她已经当过 6 年的大学校长了。她是在 1995 年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担任顶尖大学校长的非裔美国人的——那一年，她被选为美国著名的文理学院（也是女子学院）——史密斯学院的校长。

提尔曼 1986 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工作。2001 年成为该校历史上第 19 任校长时，她是该校历史上的首位女校长，也是该校历史上首位理科背景的校长——过去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都是由经济学家或者人文学者来担任的。

金勇 2009 年 3 月 2 日被任命为达特茅斯的第 17 任校长，当年 7 月 1 日走马上任时，他成为常青藤盟校中的第一位亚裔校长。

很多人可能会关心，这些人从校长位置上退下来之后会做什么。对此，提尔曼和列文都表示，会休一年的学术年假，之后会回到所在的学校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而从布朗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现年 67 岁的西蒙斯继续在该校担任比较文学和非洲学研究领域的教授。在她刚刚退下来时，曾有记者问她是否考虑过出任美国教育部长，西蒙斯直言对此没有兴趣。

在美国的大学，一般来说，只要教授不想退休，就可以一直继续当教师，直到不想干、不能干为止。因此，上述校长在退下来后，他们最想做的还是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校长不必非与教学、科研绝缘

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管理者。因此，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在回顾校长任职期间的工作与成就时，他们都着重地谈到了自己作为校长所带给学校的变化。据此，我们不难看到，他们确实是作出了极为耀眼的业绩，引领着这些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大步向前。作为管理者，作为顶尖大学的领军人物，他们当之无愧。

然而，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校长，一以贯之的身份应该是教师和学者。这样说的目的是想陈述一个事实：作为教师和学者，即便是在校长任上，从事一些（哪怕是少量的）教学与学术工作应该在情理之中。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近年来人们在讨论大学校长的职责时，有过分强调校长作为管理者的倾向，有关部门也要求高校的党委书记与校长要“全身心投入学校的管理工作”。有不少文章还不断从国外特别是美国高校中寻找例子，说明高校领导做职业管理者的必要性。

其实若仔细观察，就在美国的顶尖大学，我们也还是能够发现一些不同的例子，即一些顶尖大学的校长还在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

比如上述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提尔曼。从 2001 年至今，身为著名生命科学家的她在担任校长的 11 年间，一直都在上课。而她的学术研究也未曾间断过。据普林斯顿大学的报道，她的研究在相关领域中一直处于前沿和开拓者的地带。2007 年，她因对所在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而被授予美国遗传学会奖章。

如果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耶鲁大学校长列文在给全校师生的信中所说，“我终于可以有时间去完成一本反思高等教育与经济政策的书了”，这位经济学家实际上是在说，他并未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只不过自己在校长的任上，没有时间去写罢了。没有时间做，和不去做、不再做，是

两回事。

当然，笔者非常理解当前中国语境下国家、社会以及民众对于大学校长的期待，也理解大学校长所以要作出承诺的决心及其背景。所以提出上述观点和论据，只是想说，其实一切都没有那么绝对，不必非要强求与教学和学术绝缘。现如今的当代大学中，已经不大可能再出现完完全全的管理者了。未来越来越多的将会是教师与学者出身的大学校长。现在的大学校长越来越年轻，而且无不是优秀的教师与学者。他们如果长期脱离教学与学术岗位，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学术资源的浪费；而且卸任之后，他们再如何回到原来的工作状态？这其实是个值得深思的教育管理问题。

美国顶尖高校开始新老交替

在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的 2012 年，美国的八所顶尖高校，已经有两所校长易人，而另外两所校长也已宣布辞职，搜选校长的工作已经开始。这实际上已经预示着美国顶尖高校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美国高校进入了校长新老交替的时代。

据美国有关统计数据表明，在其 69 所顶尖大学的校长中，现年 70 岁以上者占 9 人；60~70 岁之间者最多，有 45 人；50~60 岁之间者有 14 人，50 岁以下者仅 1 人（48 岁）。因此，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者认为，美国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大学校长大换血的时代。

在当下的美国，大学校长的平均年龄为 60 岁，校长的任期并不固定，但一般来说，任期 8 到 10 年比较正常。据 2007 年美国对 2000 多名新老高校领导人的调查，大家普遍认为，平均 8 年半是比较标准的大学校长任期的时间段。

既有趣也值得关注的是 2008 年的一项独立调查。数据显示，约有 1/3 的主管学术的官员都不愿去当校长，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对当代大学校长职位缺乏热情，也对这一引人注目的职位可能影响个人生活而感到担忧。

尽管如此，正如美国《高等教育纪事》中所说，现在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了“卖方市场”，还是会有大批有实力的候选人正在恭逢其时地等候被挑选或者积极参与竞聘。新的校长也会登台亮相，成为新一代的大学领导人。

新的大学校长将给美国高等教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带来怎样的变化，那还需要假以时日再作判断。

中国科学报 2012-10-10

美国学术协会：先进大学的思想聚集地

在美国，各种学术协会为推动美国学院和大学的转型，建立以研究为导向的大学提供了学科基础、学术规则和交流平台，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兴起和发展的原发性推动力量之一。

在美国，学术协会的历史已经有近 300 年。美国哲学学会是美国的第一个学会，成立于 1743 年。受美国哲学学会的影响，美国科学与艺术学会于 1780 年在波士顿创立。而到了 19 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学科的不断分化以及学术职业的专业化，美国不断涌现出许多学术协会。

美国学术协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承担起推动研究型大学兴起的桥梁作用，其之所以能够胜任这一责任，是与学术协会所具有的先天素质和优势分不开的：学术协会不仅是美国最古老的行业协会，而且始终是世界先进大学思想的聚集地。因此汇集了不同时期先进大学思想和学术思想的美国学术协会在研究型大学的兴起过程中发挥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功能：不仅仅是研究

在一些人看来，学术协会的职责无外乎学术研究，其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学术协会的职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和教育功能。许多学术协会都是美国乃至世界闻名的科学团体，促进科学和学术发展是它们的第一使命。如美国哲学学会明确宣布自己的使命是“促进实用知识”的发展，这些实用知识在 18 世纪主要表现为农业、工程、数学、化学、物理等，19 世纪中后期，学会又将关注点拓展到美国古生物、地质、天文、气象、印度人类学等知识领域。

在教育功能方面，很多学术协会都明确提出要促进某些学科的教育。美国工程教育学会于 1946 年成立。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由于越南战争和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发校园抗争，促使其将重心转向教学；而随着硅谷经济的崛起以及高科技公司展现出来的美好前景，又将重心转移到工程研究上。

其次是交流和服务功能。出版和会议是学会最主要的交流形式，许多学会都有固定的连续性出版物，包括杂志、学报、会刊、公报、报告等。同时，大多数学会都会定期召开各种形式的学术会议，通过这种方式为本学科的交流和合作提供专业平台，促进学科知识的流动和生产。

学会的服务包括内部服务和外部服务。内部服务面向本学会全体成员，包括提供交流和发表平台、吸收新会员、化解矛盾和纠纷、寻找发展机会等。外部服务面向外部社会，主要包括社会咨询、技术支持、图书馆、博物馆等服务。此外，大部分学会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些图书馆和博物馆一般都挂靠于某个研究型大学，可以为读者提供出版物和电子资源等方面的服务。

第三是规范和协调功能。所谓学术协会的规范功能，是指学术协会在学科和行业发展中所发挥

的一系列作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学科标准和学术规则来实现。从历史来看，行业和学科的分化相对比较漫长。在美国，直到 18 世纪中期，行业、职业和学科的专业化趋势才逐渐显现出来，学术协会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学术协会的协调功能是指它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包括学科冲突和利益冲突等。以美国国家标准学会为例，它不仅是美国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和管理者，而且还协调着国内其他各机构、各团体的标准化活动，并代表美国参加国际标准化活动。

此外，美国学术协会还具有激励、示范等其他功能，这些功能使学术协会成为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非常活跃的功能性组织，也成为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方面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作用：制定政策、推动交流

在美国，学术协会具有着建立学科基础，引导美国传统学院向研究型大学转变的功能。这是因为美国大学的研究功能最初是在大学外部开展起来的，各种科学团体、协会、试验站才是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的主体。而研究功能进入美国学院和大学主要由四方面的过程确定：一是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使高等教育机构出现分层和分化，一部分大学开始从事科研工作；二是知识结构的变化推动着大学学科结构的变化，要求大学参与到知识生产过程当中；三是大学资源不断增加，为大学开展多种活动提供了可能；四是外部社会支持和大学开展研究工作。

同时，学术协会还可以通过确立学术规则，推动研究型大学学术职业的专业化。

所谓学术规则，是指一切学术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包含了互为补充、相互对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关权利和保障的规则，如学术自由、教授终身制以及各种激励制度等；另一方面是有关义务和要求的规则，如学术责任、非升即走、不发表就出局等。学术规则的形成是学术职业专业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功能和形态逐渐定型，如何确保学术职业的安全就成为学者们普遍思考的问题，有关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的各种规则相继产生。

此外，知识的生产离不开交流和扩散，而学术协会则是扩散和交流知识最稳定、最有效的平台。尤其是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兴起之初，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基本上都是教学型的，校园内尚未形成以研究为导向的学术共同体，而此时先期建立起来的学术协会无疑扮演了学术共同体的角色。

学术协会一般不会直接从事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活动，但它所倡导的学科标准、学术规则、科学政策、研究方向等对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 20 世纪初以后，以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物理学会等为代表的学生协会纷纷将自己的主要功能转向制定科学政策和推动学术交流，加速构建以学科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生产和流动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 学术前沿

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自主性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吴合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毛亚庆

当今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社会生活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受到全球化的影响。高等教育也被这一进程所改变。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受到全球化新规则的挑战。在这些挑战面前，民族国家必须把握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调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特征与全球化的压力。

一、全球化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关于全球化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影响的观点是多方面的、有争议的。一方强调不可避免的同质化与合作趋势；另一方强调全球化在局部范围上的分化与竞争的趋势。

1. 趋同。全球化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首先是出现了一种指向全球层次的聚合和整合的趋势，这种聚合和整合趋势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共同的治理、发展理念及对卓越的期望。

全球化促成了共同的高等教育治理和发展理念的形成。不同主权国家进行的平行改革是基于共同的理念和模式，这些理念和模式往往会形成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趋同和相互联系。流行于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理念包括人力资本理论、知识社会、新公共管理、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等，这些理念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施加制度影响。在这些理念影响下，各国高等教育制度表现出一些趋同的特征。这些高等教育治理和发展理念促使院校朝向企业管理的组织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商业化的交易主导组织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强调产品生产在市场上的高适应性。

全球大学排行榜也是一个促使高等教育发展趋同的重要工具，并且其影响越来越大。商业性传媒和专业评估机构驱动的全球大学排行榜使得高等教育机构的全球可比性越来越明晰，并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塑造了卓越的模型。这在国家制度和大学治理两方面产生了模仿效应。多数大学形成了一个目标趋同的人力资本培育系统、科研产出系统以及创业导向的管理系统。政府和院校将全球大学排名的价值标准转化为优先事项。这种排名同时还进入了公司的人员招聘、项目合作以及捐赠者的捐赠决策中，并且影响了全球的学生选择。这种影响反过来又强化了组织和制度的趋同。

2. 分化。另外一种观点和实践指向全球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的分化。这种观点和实践致力于探索在全球实践和政策上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差异和分化，而不是简单地假设全球同质性。

在全球化挑战面前，一些国家和大学有更多的全球选择，可以将本国高等教育发展自然延伸到全球维度，而其他一些国家则遭遇很多困难。欧美高等教育传统既是近代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也是当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效仿的对象，因此，欧美各国高等教育目前还在引导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走向，是一种“主导—积极地”全球参与。部分经济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正大力发展其高等教育，特别是在国际化水平和全球竞争能力方面，但还是处于被欧美高等教育引导的发展状态，是一种“跟随—积极地”全球参与。还有更多的国家处于被动消极地参与全球化的状态。全球化进程中各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原型来自于那些“主导—积极地”全球参与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在高等教育制度上则处于模仿的地位。这种全球参与程度的差异反过来又强化了国家和院校机构应对全球化的能力差异，进而影响大学的发展水平以及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的自主发展能力。

应对全球化的另外一种趋势是区域化，高等教育区域化在水平、层次、程度上也出现分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大学都在讨论与临近国家高等教育联盟的战略意义。博洛尼亚进程作为一个区域高等教育联盟，其应对高等教育美国化的战略意义正在显现。但是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只是在向全球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端模仿、学习，没有认识到高等教育区域联盟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意义，也很少有实质性的行动。其区域化水平还处于基本的人员交流和院校合作，远没涉及自由流通、区域标准等更大程度的区域化。

3. 竞争。全球化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竞争加剧。长期以来，高等教育主要体现了服务国家发展的属性，在国家保护的基础上丛林法则并不适用于高等教育。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向纵深发展，高等教育舞台更加开放，高等教育的边界会逐渐渗透直至消失，丛林法则最终会适用于这一舞台。

全球化时代的时空压缩塑造了更多元的竞争，全球化影响下高等教育已经走向了人才、课程、科研、创新、城市影响的综合竞争。各国在这种综合竞争面前采用了错综复杂的竞争策略。首先，大多数国家都会采取内涵—投资型竞争策略。在更加全球化的时代，许多国家的竞争战略都选择投资于科学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意图加强研发导向的创新以及提升本国大学在全球排名中的位置。第二，一些新兴的有抱负的国家会采取外延—投资型竞争策略。一些国家或城市通过在圈地和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将自己再造为一个高等教育和研发活动的全球中心，并改变管制政策用来吸引高等教育提供者、学生以及资本投资，以此构建当地高等教育的全球角色。一些国家正在把自己发展成为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和枢纽，卡塔尔，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就是主要范例。第三，一些国家采取完全以商业为基础的教育出口。这些国家在国家系统中解除高等教育管制，以能够为国际学生提供完全自由的学籍，由作为提供者的机构自主决定价格和数量。高等教育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较大规模的贸易产业，成为一种教育领域的资本主义。招收国际学生为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收入，因此在维持机构生存能力上起着重要作用。第四，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其高等教育的历史优势和现实地位，采取外延—侵入式的竞争策略。许多欧盟国家的大学在其他国家建立分校，或暂时提供免费的远程教

育资源以作长远打算。

4. 合作。高等教育全球舞台上，合作是竞争的另一面。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属性有利于大规模的个体在国家及机构之间流动。传统的合作包括政府和大学在下列方面实施联合活动：教师和学生交换、课程、研究及组织管理等。合作效果是在全球创立了一个网络结构，每个大学都是一个节点，但是一些节点比其他节点更加厚实，有着更宽、更紧密的全球连结。全球化时代的时空压缩也使得高等教育的合作方式越来越复杂。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全球化的直接结果，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其数量和方式都大幅度增长。此外，高校还与海外企业、政府开展培训、咨询、参与运作等活动。这些措施既可以向属地国家输出文化价值观，同时还可以从经济和教育上支持国内大学的发展。一些学院和大学由此拥有丰富的全球业务，越来越像一个跨国企业甚至全球企业那样运作。

全球合作的另一个方面是大学生生产全球公共产品的潜能大大扩展。全球公共产品是那些有着非竞争和/或非排他性因素的物品，全球范围的人们都可以获得的物品。高等教育最有潜力从事全球公共产品生产。在很多全球公共产品生产中，积极全球外在性和消极全球外在性并存。一国的教育影响另一国众多人群是全球外在性的体现。好的一面是有利于文化、科研、理念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不好的一面是人才外溢强化了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很难对消极全球外在性进行管制，国家政府一般不愿意投资于由其他国家人们受益的工作。这使得如何投资全球公共产品成为问题。在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上，一流研究型大学是积极的行动者。这些大学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合作，通过基础研究的开放交流生产公共产品。一些大学提供了任何人都能免费进入的项目和活动，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资源行动。目前，需要给那些生产全球公共产品的大学自由生产的权力。

二、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张力

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代表了一套新的规则，但不是所有国家都按照同样的方式解释这些规则，也不能期望它们都按照同样的方式参与规则。对全球化规则的不同解释，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及相应的战略选择形成了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张力。

1. 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全球化产生的新规则引导我们重新思考高校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些新规则多数都意味着高等教育超越了国家边界。国家可以采取两种基本形式对其中的变化进行应对；或者由政府主导高等教育来应对全球化的影响；或者由市场自由调节。

全球化将高等教育与贸易联系起来，大学被期望投资于知识市场。换句话说，大学必须按照企业机构一样运行。这样一种定向在过去被看作是与大学精神相悖的。知识生产的可交易性是大学参与全球化的前提。一些国家放开了高等教育的管制，赋予了大学的贸易角色，大学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自主性参与全球化，因而增强了大学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大学在压力之下接受全球化界定的企业价值，大学在人类发展中的民主批判角色和自由创造精神也会受到削弱。虽然这样一种选择难以确保大学的核心价值，却可以缓解大学的经济危机并能获得一些经济收益和影响，因而赢得了一些

国家的青睐。市场调节的全球化代表了自由的发展趋向。

一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由政府来主导国家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战略。政府通过系列项目、工程、直接资助或管制来确定哪些大学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参与全球化。政府主导的全球化代表了管制的发展趋向。但是全球化本身代表人员、信息、学术资源乃至课程等的全球流动，其复杂性往往使得政府的管制安排与这种流动存在很弱的匹配，导致政府的战略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偏离大学参与全球的最佳方向。

2. 全球卓越与本土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卓越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成为类似货币的评价工具。实践证明，卓越的大学可以吸引人才，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构建城市和国家的吸引力。由此，每个国家的政府、媒体和公众越来越着迷于本国院校在全球的卓越表现，这几乎被各国看成重要的国家利益。这种卓越表现被转化为全球大学排名、一流研究大学及研究能力等指标。每一个全球大学排行实际上都预设了一个优秀的大学蓝图，主要是欧美大学模式，这会引导大学模式趋同，削弱机构的制度创新。如果政府过于关注一流研究型大学也会扭曲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破坏本国高等教育的多元化生态。为了增强大学的全球卓越地位，大学热衷于用国际需求来进行发展定位，用国际标准来评价知识。由此，本地需求和本土知识传统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在全球卓越的另一面是本地需求和本土学术生态。国家全球竞争力的构建理所当然需要全球定位、全球参照和全球视野。但是，对大学来说，地方和国家维度是一个自然的中心，因为大学扎根于地方和国家，高等教育更应该回应国家和地方的需求，对地方发展和变革更加敏感。对本土学术生态来说，全球排名只看到结果，却很难看到其他更令人钦佩的原则，如自由探索、创新导向及应用转化等。对大学排名和世界一流大学的迷思从根本上错误判断了西方学术模式的吸引力及其价值，一味地参照西方学术价值有可能水土不服。

3. 普遍主义与民族文化。大学自诞生以来就被看作是追求普遍主义的组织。但是，随着高等教育机构与民族国家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大学的普遍主义性质有所削弱，转而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当前高等教育的普遍主义追求再次高涨。其主要原因是全球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这种依赖性要求构建全球普遍知识，而日益扩大的互联网使得生产和消费全球普遍知识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世界各地的大学必须使他们的学生和其他公民做好准备去理解像国际恐怖主义、区域和全球冲突、全球变暖及全球疾病、国际政治体系打破和转型、经济持续增长对自然资源造成的压力等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大学越来越需要帮助人们掌握如何解决这些紧迫的挑战的知识和技能。首先，这种全球普遍知识和技能需要有一个包容文化差异的积极态度以及处理这些差异的行动。第二，全球技能还指的是用几种外国语言谈话、理解以及思考的能力。第三，涉及广泛而深入的世界历史、地理和卫生保健的全球层面，气候变化、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其他问题的知识。第四，需要了解全球化进程本身，以及应对复杂的全球挑战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大学要通过将这些

目标置于它们的中心使命来帮助研究者生产这些知识以及学生学习这些知识，并通过传播使得人们理解这些知识。

但必须承认追求普遍主义有可能削弱大学的民族文化遗产功能。全球知识和技能的生产主要由欧美发达国家所支配。目前，很多观点将全球化理解为美国领导的文化统一，这是全球化现象中最阴暗的一面。全球化将所有国家的大学放置在一个舞台上，这里是一个无边界的舞台。假如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好准备，而全球知识和技能的产生和传播又被欧美发达国家所支配，那么，那些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全球知识和技能的消费者，这是打着普遍主义幌子的新殖民主义。如何确保本国高等教育机构在追求普遍主义的同时更好地把握住主动权，使得全球知识和技能体现本国民族文化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高等教育发展命题。这涉及高等教育的语言政策、学术评价、课程内容等方面。对我国来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历史命题需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重新加以阐释。

三、我国高等教育自主发展的政策选择

全球化进程中的二元对立构成了国家选择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张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需要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二元对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模式。

1. 加强本土适应性。全球竞争既是现实，也是修辞。作为现实的全球竞争要求高等教育在人才、科技、创新等方面占据高地，但作为修辞的全球竞争却将高等教育竞争转化为排行榜、论文、规模等指标。人才、科技、创新本质上是基于国家背景的，而排行榜、论文、规模等指标却试图建立一个标准化的全球趋同大学。修辞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受商业的驱使，如排行榜就是一个典型的商业驱动的全球竞争。最近几年反映在多数大学和政府决策中，修辞的竞争取代现实的竞争，导致高等教育走向一个泡沫式的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的自主发展必须排除全球修辞所提出的标准，开发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多元评价机制。

全球化强化了质量的重要性，各种质量评估指标已经成为重要的全球修辞，质量评估必须立足一定的制度背景才具有治理意义。质量可以被比作冰山，应用的指标是可见的部分，质量文化是隐藏在下的部分。美国长期的政治和专业结构，欧洲的社团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本国特色的质量文化。在我国，当前急需根据高等教育的组织特征建立适宜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质量文化。

加强本土适应性也意味着均衡全球卓越和当地需求的重要性。在全球化挑战面前，我国应建立一个分类的高等教育系统，引导大学在准确定位的基础上参与全球竞争。目前，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塑造了一个一流的示范效应，导致很多高校投入过多的与自身使命和背景不符的精力和资源参与全球竞争。不同的高校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方式及层次是不相同的，不能用同样的资源投入模式来引导高校都采取同样的全球竞争与合作策略。实际上所有的高校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全球竞争的影响，一流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和高端人才直接面对全球竞争，更多的高校是在服务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和创新需求的基础上间接地参与全球竞争。对我国来说，应引导高校用全球视野进行思考，以

本地需求为基础进行定位，用更加多元的层次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

2. 明确发展自主性。明确发展自主性首先要明确自身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基础、制度背景、政治经济发展需求都各不相同，各国参与全球化程度及应对全球化的能力也有很大差异。全球化使得国家越来越难以控制知识在全球的自由流动。一些国家利用知识的全球自由流动来谋取全球影响力，一些国家则逐渐沦为知识的消费者。我国高等教育在发达国家的知识开放战略面前逐渐成为消费者，国外的大学、学术刊物、开放课程使得传统消费和虚拟消费联合侵占我国的高等教育市场。知识自由流动还会在国家安全和文化遗产方面产生负面作用，国家政府需要加以控制。封闭是不可取的，但是提高本土知识的质量和价值，从而提高国内高等教育对内对外的吸引力，才能构建我国高等教育在全球发展中的自主地位。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诸如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等理念和思潮通过国际组织、学术交流等传播渠道影响了民族国家高等教育的自主发展战略。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有效的教育战略，我们需要将国家政府有效管理教育的理念与反政府意识形态区别开来。一些主导全球化的国家希望所有国家都在相同的西方发展概念中走向现代。这些国家与其说是期望走向现代，倒不如说是希望从一个无政府管制的高等教育市场中获利。对我国来说，在高等教育自生能力还很弱的情况下去除管制很可能导致国家高等教育公益价值的削弱。为了有效应对全球化，政府需要提高政府管理能力。提高政府管理能力首先需求加强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应对全球挑战的规划能力。在规模扩大及整体高等教育质量不高、适切性不强的情况下，应放缓市场导向改革的步伐，着手以公平驱动型改革为基础，将教育改革从市场和经济领域拉回到教育本身以及公平的氛围中。

3. 关注文化敏感性。全球化进程中关注文化敏感性更是一个急迫的任务。在快速加剧的全球化进程中，以西方模型为基础的文化趋同获得了新的动力。在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合作中，除了传统的语言侵蚀外，人员交流和开放办学更易导致价值观的趋同。西方国家在这一进程中通过高等教育释放的力量期望整个世界在文化上更加同质，区域差异被消除，或者至少将区域差异减少至这样一种程度：对年轻一代没有备选的文化类型，不管在哪里他们都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在此背景下文化认同危机正在成为民族国家发展的重大威胁。为此，必须关注高等教育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敏感性。

文化的主要载体是语言。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在全球竞争中语言对个人、机构乃至国家的重要性。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里，第二外语特别是英语已经成为提高效率和增进沟通的主要工具。当今很多机构、企业的业务都是在全球开展的，对其潜在雇员的英语要求逐渐提高。对大学生来说，多掌握一种语言能够增强就业能力。语言最重要的功能还在于文化交流，学习外语更容易接受文化的“他者”。当前我国大学英语地位超越母语地位，教学和研究的材料很多来源于英语，这强化了英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中心论，使得接受教育的人逐渐怀疑我们自己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对一些长期浸染

异域文化的人来说还会产生个人身份怀疑。对语言战略来说,要认识到语言的真正价值在于构建具备民族身份的学生的跨文化思维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而不是推崇“他者”的文化假设和偏见。在全球化进程中需要在强化母语的本体价值的基础上实现外语的工具价值。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当前一种关于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观点实际上指的是美国通过高等教育、媒体、娱乐等渠道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包括政治理念、管理理念、社会和文化习惯、对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假设等。从价值观上说,高等教育不能反对全球化,但也绝对不能拥抱全球化。静态文化观并不可取,但是丧失核心文化的演变更危险。对我国高等教育来说,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全球化进程中高等教育如何传承捍卫我国的核心文化,并通过和世界文化的双向流动进行文化创新。

4. 走向深度国际化。国际化是应对全球化的一种工具,但只有走向深度国际化才能起到一定的效果。首先,这种深度国际化要求从数量转向质量。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商业国际化不同,这些国家的国内需求难以满足高等教育市场的供给,而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市场还远远没有满足需求。我国高等教育目前最难以适应全球化的是高等教育质量。因此,对我国来说,国际化的创新和质量要求要远远大于经济价值。国际化的商业运作不应该是我国目前的选择,我们要做的是在国内建立高等教育国际中心,有选择地引入优质资源促使国内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其次,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要走出国际教育消费者的阴影,在内部质量提升的基础上积极走出去,拓展各种国际合作方式,从国际教育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第三,要超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教育维度,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区域化、城市化、产业布局等外部因素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济政治意义。

《中国高教研究》2012 年第 09 期

影响高校办学的四个因素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 黄光扬

从现代大学发展来看,办学特色既是办学实力的一种表现,又是质量的另一种解读。办学特色越多越鲜明,高校的综合办学实力就会越来越强。本文针对影响高校办学特色生成的四个主要因素进行论述和探讨。

一、办学历史传统的文化积淀、传承与发展

每一所高校都有其独特的办学传统，它源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特定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英国著名的教育家阿什比曾有过一句名言：“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事实上，高校在办学过程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办学历史传统的影响，并在时间流逝、空间变换以及持续教育活动中，办学历史传统有可能升华成为某种可贵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形态，这就叫办学历史传统的文化积淀，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校办学历史沿革和办学传统仅仅是形成办学特色的基础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最终决定学校特色的主要力量乃是高校在办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创造性地、持续地对传统的不断继承与扬弃，对环境的不断适应与改造”。因此，对于那些办学历史相对比较悠久的高校，若要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应当在办学历史传统的文化积淀、传承与发展方面做出刻意的努力。

一是找寻和发现闪光点。办学历史相对比较悠久的高校，在其发展过程中通常有特殊的办学背景、关键的历史人物、重要的办学事件和变迁、充满哲理的办学名言、敢为天下先的一些办学理念和办学举措、独特的校训校歌校风等，高校应当重视对这些办学历史传统进行研究，寻找和发现学校办学历史传统中的闪光点。

二是挖掘和提炼形成文化积淀的办学特色。学校办学历史传统中一些闪光点，如果在办学时间延续与空间拓展中能够一路照耀学校的办学活动，并且以某种形式积淀成为学校的独特办学文化而传承下来，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和声誉，它很可能就是学校的办学特色之一。因此，高校应当重视学校的办学传统文化研究，挖掘和提炼业已形成文化积淀的办学特色。这不叫无中生有，也不是要文字功夫，而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高校办学文化研究，更是有价值追求的高等教育活动及其进化升华的一个过程。

三是通过弘扬和发展使办学特色更加鲜明。在对高校办学历史传统的文化积淀与传承中，无论是意识到的还是无意中形成的办学特色，如果不能刻意地对它加以强化建设和弘扬发展，就不能形成内涵丰富的办学传统文化，也不能与时俱进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更不能使业已形成文化积淀的办学特色鲜明化。因此，学校要采取有力措施，比如通过树碑立传、文字宣传、校情校史教育重新解读、创新改造、强化相应配套的教育改革举措以及广泛的教育过程渗透等，强化业已形成文化积淀的办学特色在人才培养中的教书育人效果。学校尤其要结合校园文化建设，把办学历史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校园文化因素相结合，突出学校的办学特色，能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教育效果。因为有形无形的校园文化总是在学生成长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并在有意无意中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和上进动力。这样有利于学校培养出具有独特精神品格和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能使业已形成文化积淀的办学特色更加鲜明。

二、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和相应的模式创新

人才培养目标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一所学校有着明确的、生机勃勃的

办学指导思想与目标，对于高校形成办学特色起着重要作用。学校类型层次不同，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可能不同，特色各异。因此，高等学校在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上要形成自己的特色，重点考虑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相符合，与本校的历史积淀、学科优势、校园文化相统一。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与特色化正是我国高等教育个性化发展的生动体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是学校立足社会生命之源，是新时期高校的核心任务。而新时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确实在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主要涉及两个复合层面：人才培养的价值层面和模式技术层面；教育教学活动层面与体制机制层面。

简单地说，价值层面是国家对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所做出的价值选择，通常体现在国家重要的法规文件和政策中，统领每一所高校的办学方向和价值取向。模式技术层面是高校依法办学，并结合学校具体情况对各个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总体设计以及制定具体操作技术路线。不同的模式技术路线，将对笼统的培养目标与规格、能力与素质要求、课程结构与内容标准等做出不同的表述，并有不同的实现路径。在我国，价值层面具有权威性、政治性和统领性，而模式技术层面从属于价值层面，具有多样性、创造性、学校及学科的独特性等，它往往是学校办学特色的肥沃的生长土壤。教学活动层面是学校落实人才培养目标、实施特色办学的根本落脚点，同样涉及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资源建设利用和课程内容更新、课堂教学改革和评价方法改革等多个方面。体制与机制层面更多的是体现在教育体制、学校办学自主权、教育评估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学校规章制度、学校各项管理制度、各项约束和激励机制等方面。教学活动层面和体制机制层面之间本应具有紧密和实质性联系。

就当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言，当务之急是抓好以下两个关键环节：第一，在坚持国情本位和国际视野的原则下，敢于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因校制宜地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我们不能否认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和特色，但高校人才培养中对大学生的社会属性等方面的品格教育训练还不够到位、不够全面、不够得力。因此，可酌情借鉴国外以及港台地区适宜的教育思想、目标体系和教育体系，来充实我国高等教育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目标的内涵。第二，促进教学活动层面和体制机制层面之间形成紧密和实质性的联系，建立和谐校园。就当前我国高校办学过程中，教学活动层面和体制机制层面之间往往有一些矛盾和对立存在，比如政府教育管理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之间、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任教师之间、学校僵化呆板的管理条例与教师科研人员的自主性及创造性之间，都存在一些矛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快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弱化“官本位”思想在高等教育活动中的不良影响；按照高等教育规律办学，明确并充分落实学校专任教师与科研人员在高校办学中的主体性地位。

假如我们的高校都能从自身特征出发，在国家总的政策法规框架要求下，执意人才培养目标调

整及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这应该成为高校形成各自办学特色的多极生长点。

三、大学重点学科建设与优秀学科带头人的作用

学科专业建设是学校工作的龙头，是学校建设发展的主题之一，是最能体现办学特色的方面。除了部分历史悠久的著名高校外，多数高校由于各方面原因，校内不同学科专业在教学、科学研究以及师资队伍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一定时期形成非均衡发展状态，部分学科首先崭露头角，是办学特色的初始状态。在刻意追求办学个性与办学特色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重点建设与扶持那些已崭露头角并且富有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学科专业，这对于凸显与形成整个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办学特色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措施。重点学科建设要更新观念，不能仅停留在多给钱多花钱、多给优惠政策多享用、多下指标多干活的表层上。重点学科建设也要走出以下几个误区：简单拼凑优质资源，分分合合；不择手段跑项目、跑奖项；过于重视量化指标的管理评估制度；重散兵游勇轻团队出击，建设成果散乱，无核心无精品无特色；包装和忽悠态度，应对评估验收。因此，当前高校重点学科建设要强调：有机地整合优质资源，强强联合也要有利于团队合作、形成合力、发扬光大学科优势；确定核心重点，围绕核心重点进行规划建设；改进重点学科建设评估验收的制度方法，强化核心意识、质量意识、特色意识、精品意识、创新意识和团队有效合作等意识。

高校要办出特色，优秀学科带头人或大师级人物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个在某一学科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或拔尖创新型人才，很可能就是促成某个领域具有办学特色的决定性因素。现在高校之间对高层次创造型人才的竞争十分激烈，许多高校都在积极培养和引进一批优秀的学科专业带头人和大师级人物。且不说国内高校，就是当今世界上许多一流的大学，也照样把目光聚焦在大师级人物或拔尖创新型人才上面。优秀学科带头人的产生，既有偶发因素，也有培育的因素。偶发因素主要体现在校内出现若干特别拔尖人才和学校引进校外优秀学科带头人，他们的研究方向独具特色、贡献突出、潜力很大、影响甚广、优势明显、学科发展意义重大。培育因素主要体现在传帮带和学校重点扶持方面。无论是哪种情况，优秀学科带头人都要列入学校发展战略和办学特色建设规划之中。站在科学发展和特色办学的高度上，科学遴选优秀学科带头人，依靠团队力量，实质性地把重点学科做大做强，有计划有策略地推进学校重点学科建设规划，带动整个高校的学科发展，把学校的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同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战略发展联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校的学科优势、办学特色和社会贡献得到广泛的认可。

四、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及毕业生卓越的社会贡献

绝大多数著名的大学，他们的办学特色有相当部分是大学教师对科学事业以及毕业生对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卓越成就和贡献支撑的。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这三大任务实际上是对过去我们常说的高校具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

务”三大功能的另一种说法。这也意味着高校办出特色，不仅可以体现在教学方面与科研方面，也可以体现在高校的社会服务方面。新时期高校办学如何在履行社会服务功能中取得卓越贡献并形成办学特色？这的确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大课题。我国高校向来注重社会服务功能，但能够持续取得卓越贡献并逐步形成办学特色的还不多见。新时期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如何在履行社会服务功能过程中追求卓越，必须注意：

加强研究和规划，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服务能力。在高校社会责任与区域社会发展、与地方政府作为、与一个个地方企事业单位发展的联动中，找到结合点和突破口。

摆出“站桩式”发展策略，重心下移，横向铺开。高校服务社会功能要摆入各个院系的发展战略规划之中，进而具体落实到各个学科或专业、各位教授、各个教学团队和科研创新团队中去，做到社会需要与学校能耐之间的优化组合、人事匹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社会发展有需求、政府作为有参谋、企事业单位遇到问题有帮手、产学研用结合有坚固平台；另一方面，高校的教师普遍有合作单位、项目、经费和作为，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加快了转化速度，毕业生有出路受欢迎，学校可增加经费来源渠道，高校办学声誉和特色可逐步提升。

高举文化发展繁荣的旗帜，突出高校在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引领作用。把校本文化特色与地方区域文化特色相结合，奏响和谐的文化旋律，发展和繁荣区域文化，在高校和区域社会之间形成共鸣腔，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推动力。加强高校学术道德、学术风气、学术研究队伍等建设，弘扬正气使社会风气得以清新等。继承和弘扬历代中国文明发展的成果和成就，发扬光大本校先进而独特的校园文化，重视开发地方文化经济的特色课程，培养独具品格、独有才能、独有特色的人才来服务于社会、贡献于社会，促进社会前行。所以，地方高校办学不可盲目攀比，应当积极培育服务社会能力，坚持以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为主攻方向，以持续和突出的社会贡献促进学校办出特色。

毕业生的人才特色以及持续显著的社会贡献，能够体现大学的办学特色。高校的中心工作是培养人才，毕业生好比是高校的“产品”，衡量一所高校办学是否有特色，归根到底要看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特色与社会贡献。这种特色可以体现在大学生人才的道德素养、公民素质、个性涵养、专业知识技能、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敬业精神、社会适应能力、创业能力、自主学习与发展潜能、社会责任感与团队合作精神等方面。当然，人才特色和质量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最终在于对社会做出突出的贡献中得到社会的公认。对一所高校办学水平、人才质量与社会贡献等评价，不能仅局限在培养几个科学家、几个院士、几个政治家、几个国家级奖获得者、几个公司大总裁方面，而应该更加注重群体性、优质性、持续性、发展性、特色性等评价指标。

国外开放课程对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的启示

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张林栋

一、国外开放课程的发展现状

世界一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于 2001 年 4 月在《纽约时报》上宣布一个为期十年的计划：把学校的 2000 多门课程放置到网络上以供全世界教师、学生、自学者免费学习。这个计划称为麻省理工学院开放课程项目 (MIT Open Course Ware, MITOCW)。开放课程的宗旨是免费、开放地为全世界的学习者提供教育服务，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获取优质课程资料；麻省理工希望，以这个计划带动或促进其他所大学开放课程，供同仁参考学习。在新闻发布会上，韦斯特 (Charles M. Vest) 院长在描述开放课件计划时，不无憧憬地说：“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所期望的是这样一个富于创造力的、没有界限的、充满挑战的项目。”

麻省理工开放课程项目成功实施，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麻省理工开放课程项目的理念导向、运作模式和应用情况为诸多组织所关注、认同和仿效，逐渐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开放课件运动 (OCW Movement)。有的高校受开放共享理念的启发而发起实施体现自己特色的开放课件项目，有的组织致力于已发布资源的翻译和本土化，有的组织努力把这些优质资源引入到课堂教学应用中，逐渐形成三种不同的合作模式。2005 年春，麻省理工学院开放课件项目、犹他州立大学开放课件项目、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等近 20 个致力于教育资源开放共享的高校、组织、基金会等联合建立开放课件联盟 (Open Course Ware Consortium)。

迄今为止，麻省理工开放课程运作已有十年时光。十年来，超过 80% 的麻省理工教师通过开放课程自愿共享自己的教学资源，资源量累计超过 5 万份，全世界约 1 亿学习者使用其课程资源。2011 年 4 月，开放课件联盟组织的“开放课件十周年庆典”国际会议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这次会议，麻省理工以“解放知识，给力心智” (Unlocking Knowledge, Empowering Minds) 为主题，不仅回顾其开放课程过去十年的成长历程，总结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是规划他们下个十年的发展，雄心壮志地提出“惠及 10 亿人 (Reaching One Billion Minds)”的计划。开放课件联盟的发展前景广阔。

二、开放课程对我国高校教育教学的冲击

国外开放课程给中国高等教育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许多学者意识到它们对中国高校教育教学形成一种冲击。詹泽慧、贾义敏、罗双兰等，通过纵向比较，探讨它们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侯爽、高慧君、赵洋等，探究它们对于中国精品课程建设的启示；马红亮、卞文献、吴美娇等，论证它们对求知者学习方式的影响；王亮、王立等，认为开放课程会促进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化和高校教师发展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开放课程开阔国人的眼界，激发求知者的学习热情，许多学习者，包

括大学生和大学年轻教师，纷纷网上“淘”课，开起“洋荤”。笔者也是“淘”课的受益者之一。最近囫圇吞枣地下载观看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几门开放课程的视频，也浏览他们文科专业的备课材料和部分课堂实录，深有感触：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文科教学日趋穷途末路，学生兴趣寥寥，而“洋”教授的随意洒脱的演讲却备受追捧呢？经过比较与反思，笔者发现“洋”课至少有三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一）在目标上，注重阅读，强调写作，着力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

美国教学研究专家威廉姆斯（Frank Williams）认为，人的创造性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组成的：一个是创造性思考能力，属于认知范畴；另一个是创造性倾向，属于个性范畴。以此，他提出三维空间创造性教学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创造性教学的目标不仅在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考能力，还应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倾向。为达到这两个目标，教学必须是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和教学内容三者之间协调一致的活动。因此，三维创造性教学模式分为教学内容、教师教学策略和学生行为三个层面，其中第三个层面最为重要。学生行为包括属于认知方面的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独创性和周密性；属于个性方面的好奇心、挑战心和想象力等八个思维品质。写作是培养学生认知思维和个性思维的最佳训练方式，它能开发学生“善于思考；勇于猜测；积极寻找各种可能性；从杂乱中理出秩序；愿意探究复杂的问题或主意；寻根究底，以求彻底了解；肯深入思索事物的奥妙；把握特殊的征象，预测和观察其结果”的良好素养。

创意写作是耶鲁大学的强项。在历史上，耶鲁不止是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输送大批颇有成就的作家，而且让所有专业的毕业生都具有很强写作能力。写作课教师之中，有十四位教学名师，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可以选修，常常是一座难求。耶鲁人坚信深厚的文学功底是进行创意写作的基石，宽泛、深刻（甚至贪婪）阅读的质与量是文笔优美必不可少的条件。英语语言文学的基础入门课中就有一学年的《写作研讨》（Literature Seminars 1&2）和一学期的《现代论文读写》（Reading and Writing the Modern Essay），也有颇受欢迎的《每日主题》（Daily Theme），要求学生听课一周，每日写不少于 300 字的文章，有老师专门辅导修改。面对所有专业的《创意写作》四年不断，既有四大文体（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初级班，也有高级版，甚至新闻写作课，科幻和魔幻写作课。

麻省理工的课程更为开放，几乎所有课程的相关材料都可以下载共享。通过其中一个课程教学的实施纲要，我们便可以看出西方教育教学注重发掘与促进学生的创造天赋。他们有一门《文学写作课》（Writing about Literature），每周上课时间为 3 个小时，重点讲解包括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等五位作家的五部代表作品。该课程描述强调“旨在增加学生阅读文学文本和藉此进行写作和交流的乐趣及技巧。”在熟读作品的基础上“鼓励学生以探究性阅读和作鉴赏报告的形式，对作品做出独立判断。”结课时，“让学生写出一篇 20 页的好文章并强调文章的仔细修改……并配有一位写作助教对学生的草稿及修改进行指导。”

注重写作，可以培养写作能力；而注重建立在深刻阅读与独特理解基础之上的写作，不仅可以

培养写作能力，可以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与创造性思维成果表达能力，更可以让学生养成做学问或学问探究的认真、严谨、负责的态度。然而，写作对中国大学学生来说，一直是最令人头痛的事情：他们长期习惯于记背教师提供的标准答案，习惯于从多项拟定答案中选择一种所谓“最佳答案”，鲜有自由表达机会，鲜有自由表达能力培养与提高机会，因此，鲜有自由表达能力，也鲜有个人独立见解可以表达。缺乏健全的教育教学理念和长远教育教学目标，缺乏循序渐进的有计划有目标的指导，加上对写作意思的种种无意与有意的压制、对写作能力及其培养机会的种种无意与有意的剥夺，如客观试题与标准答案之类的阈限式教育行为，阈限学生自由想象的翅膀，不止伤害学生的自由表达能力，更伤害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意思与能力。

（二）在讲授上，注重对话，强调交流，着力构建自由式学习体验

巴西教育家弗莱雷（Paulo Freire）在其代表作《被压迫者教育学》中提出闻名于世的“解放教育思想”。解放教育思想是对传统的主流教育思想和课程教学理论的彻底松绑。“讲授式教学”把学生当作“容器”，尽职尽责的教师总是想方设法地把“容器”灌满；“讲授式教学”一旦以“储蓄教育观”为背景或潜在支持，就只会将学生视为知识“存储罐”，只注重压迫式知识讲授与压迫式知识记忆，在压迫中学生只能被动接受，在被动接受中放弃、消蚀与丧失创造性。弗莱雷提倡应用民主平等、双向交流的“对话式教学”取代单一的“讲授式教学”，用教会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具有批判意识的“解放教育观”取代“储蓄教育观”。许多备受推崇的开放课程，都很好地体现出民主平等、双向交流这一教育理念。

《公正》或《正义》（Justice）课是哈佛建校以来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每年，近千名学生挤进山德斯（Sanders）大礼堂去聆听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讲述公正、平等、民主与公民权。桑德尔的魅力不在于他给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是帮助他们在面临日常道德抉择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运用批判性思维。

在十二集的授课中，桑德尔精心运用生活中真实案例，设计出巧妙问题，让学生置身于两难的道德窘境中，让正反两方各抒己见。有时他采用环环相扣、步步紧逼的提问方式，促进学生再次斟酌自己的回答。而他提供的结果（而非答案）却往往出人意料，其目的在于向学生揭示社会上重大的道德问题从来不是黑白分明的。通过有理有节的矛盾梳理，不知不觉中培养学生犀利的道德判断力，以便更好地运用明晰的道德观念去理解在民主政治中所遇到的不同主张。难怪前任公正课教员沙利文（Kathleen Sullivan）由衷地佩服道：“（他）可以在如此庞大的教室里很有效率地进行引导，像一位指挥挥斥方遒。他所制造的道德窘境十分尖锐，以至于惟一的解脱途径就在于思考。”

开放课程中其他专业老师的授课方式也让网上“淘课大军”大开眼界。最受欢迎的是高达 22 万播放次数的耶鲁哲学课《死亡》（Death）。牛仔裤、衬衫、帆布鞋，卡根（Shelly Kagan）教授盘腿坐在桌子上侃侃而谈，轻松的氛围，深入浅出的演讲，使网友们叹为观止：死亡还有这么多哲理。麻省理工物理学卢因（Walter Lewin）教授讲课时，为介绍钟摆的周期与吊挂物体的质量无关，教

授躺在从天花板垂下的吊索上，让自己像钟摆一样摆荡。“各位请看，这可是钟摆之母”。他在讲台上荡来荡去，然后喊道：“物理学果然不假！”教室里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

听课，不是在被动中被灌输与真实世界不相关的知识和与真实生活不相关的能力，而是在双向交流、平等对话中面对真实世界及真实世界中的问题，学会认识、思考与解决真实世界中的问题，在认识、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知识与提升认识、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课堂学生舍得“逃”么？

（三）在评估上，注重原创，强调独立，着力培育创新性问题解决能力

美国创造性思维研究专家帕内斯（Sidney J. Parnes）根据著名创造学家奥斯本（Alex Osborne）的创造过程理论，提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这一模式的理论前提是每个学生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创造性，学生身上蕴藏着的创造性可以通过教育和培养得到提高。在学生创造性的培养中，已有的知识储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的创造性只有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为此，帕内斯提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五个步骤”，即：发现困惑、发现资料、发现问题、发现构想、发现解答，并寻求接受，发展行动计划。

西方教育教学时刻把创造性思维培养放在首位，开放课程几乎无一例外。在耶鲁开放课程的首页，耶鲁人阐明他们开放课程的宗旨：

耶鲁开放课程反映人文科学教育的价值观。耶鲁教与学的理念旨在培养知识宽泛、根基扎实的知识分子，而又不预先规范他们的具体实用性。这种方法超越了简单的事实和概念的获取，培养他们严谨、独立思考的技巧和习惯，分析、提问和寻找答案的能力。我们希望网站上的课堂讲授和授课材料会成为批判性思考、独创性想象和知识探究的来源。

虽然注重对话与交流的课堂教学轻松愉快，但是教师们的治学态度却十分严谨，对学生的学业评估也特别严谨与严肃。学业评估考核考试，都以解决问题为首要目标和主要内容，因此，都注重原创，强调独立。课堂活动和讨论，要求学生表达个人见解；平时小论文和期末大论文，更要求学生表达个人见解。论文以及一切书面作业，无论大小，都要表达个人原创性、独立性见解，抄袭是第一大忌。麻省理工学院文学院对待学生书面作业中的抄袭行为，有如下政策：

抄袭——未经标注引用别人的脑力劳动成果——是一种严重的过错。文学院的政策是给抄袭的同学判不及格，并且教员要把情况提交纪律委员会。所有上交的书面作业中来自课堂之外的全部信息必须清楚标注。引自别人作品的见解、论点和措辞必须标明并加以脚注。

麻省理工学院写作与人文研究所（Writing and Humanistic Studies）网页上有一篇公告式文章——《避免抄袭》（Avoid Plagiarism）。这是一篇公告式文章，专门讨论抄袭问题。文章内容包括何为抄袭、抄袭分类、为什么不要抄袭、如何避免抄袭等，教育学生养成勤于思考、严谨治学的习惯。

反观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业评估考试考核，无论是采用选择题、填空题或搭配题

之类的机械形式，还是采用简答题与论述题之类的灵活形式，都将学生限制在种种预设答案或“标准答案”之中。将学生限制在预设答案或“标准答案”之中，往重处说，是强迫学生抄袭；往轻处说，是引导学生因袭。

三、国外开放课程的可学习与可借鉴之处

国外开放课程，对我国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尤其是对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有许多可学习与可借鉴之处。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已经日趋边缘化，要改变这种状态，要提升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教育教学质量，必需进行深度改革，以下几点是当务之急。

（一）克服浮躁与功利心理，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解读能力

浮躁似乎是这个社会的通病，功利之心使得“象牙之塔”不再平静。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各类证书考试使得高校学子疲于应付，整日忙碌于一知半解甚至知而不解的死记硬背，而无暇顾及人文学科的修养和提高。出入于各种培训班的莘莘学子当然没有时间“沈浸醴郁，含英咀华”。生活中没有阅读，也就缺少诗情画意。北大教授钱理群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得不发人深省。

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应该提倡文本细读。“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做到“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文科教师应精选本学科原汁原味的代表性作品，和学生们共同阅读、体味、揣摩和想象。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替代学生的阅读实践，而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理性思维的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鼓励学生写读后感。学生先有丰富渊博、心同此感的“输入”，才会有才思泉涌、新颖独到的“输出”。

（二）摒弃灌输式教学，加强案例分析，培植学生质疑能力

应试教育使老师成为“输液器”，而学生成为盛载知识的“容器”。枯燥教条的理论课堂已无法满足求知欲强的青年学子。凡事没有绝对的正误与黑白，学生所要聆听的是思想的碰撞、智慧的交流。哈佛大学沙哈（Tal Ben Shahar）教授的《幸福课》（Positive Psychology: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也是备受欢迎的公开课之一。他在课堂上这样讲道：“教育家 Neil Postman 曾经说过，‘孩子进校时像问号而毕业时像句号，’我的希望是本课程培养的问号要比句号多。”接着，他又谈到“in-formation”和“transformation”的区别：“information”指用信息或知识把我们的容器灌满，直至膨胀；“transformation”是指容器会适时变形，即有批判地接受并运用知识。

沙哈教授和桑德尔教授课堂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运用鲜活的案例分析讲解深奥的理论。面对开放民主的 21 世纪，我们的大学教育也要摒弃“灌输式讲授”，提倡“探究式教学”。教师要善于撷取生活中真实的理论案例，创造平等对话、自由宽松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从而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好胜心和求知欲。同时激励学生向“权威”挑战，培养质疑精神；鼓励学生用批判的眼光去观察问题，不要人云亦云，而要特立独行，大胆指正教材、资料中的错误与漏洞，

纠正教师讲授中的错误与不足；让学生在广泛学习、观察、比较现象的基础上，通过个人深入思考分析，在发现矛盾、发现疑点的过程中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批判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摒弃封闭式考试，改用开放式学业评估，培育学生探索能力

改革传统的学业评估多采用封闭式考试考核。封闭式考试考核，封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式封闭，即多采取闭卷考试模式；二是内容封闭，即采取选择、填空和简述等形式让学生给出预设答案或“标准答案”，再根据预设答案或“标准答案”评判学生学业。这种封闭式学业评估抑制甚至扼杀学生学习积极性与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教学质量。要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与自主性，就要大胆摒弃封闭式，探索开放式学业评估模式。

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增加考试、尤其是制卷考试的开放性。在制卷考试试题中，尽可能多地包括选做题，选做题中尽可能多地包括生活案例分析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点选择，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阅读积累、生活经历与思考答题。这样考试，既可以考查学生对所学理论的理解、运用、验证和接受状况，也可以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灵活、开放式的考试，可以将学生从对已知与旧知的死记硬背中解放出来，将时间与精力投放到对已知与旧知的校验与批判上，投放到对未知与新知的探索与创造上。

其次，应该尽可能地多采用论文考察模式。论文考察，应该是平时小论文考察和期末大论文考察相结合。论文考察，在形式上，应该引导学生结构的完整，构思的严谨性，论点的明确性，论证的充分性，资料与文献引用的规范性；在内容上，应该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大胆表达自己的真实体验与真实感悟，大胆发表自己的独特发现与独特见解，甚至大胆批评已有学说、特别是权威学说，大胆修订、改进、完善已有学说，直至创造新学说。在论文写作，还应引导学生超越学业评估，直接关注本领域或相关领域理论与实践问题，直接通过独立探索来回答这些问题，向学术期刊投稿，收获辛劳的果实，品尝成功的喜悦。

教育的本质目标是促进“人的心智力的发展”，是促进“人的理性力量、道德力量与精神力量的最充分发展”，而心智力量与理性力量、道德力量、精神力量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理性力量、道德力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展，主要通过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教学来实现。培养解读能力、培植质疑能力、培育探索能力，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教育的应然目标，更是整个教育的应然目标。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教育教学要摆脱边缘化状态，要实现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教育的应然目标，更要实现整个教育的应然目标。

《现代大学教育》2012年第04期

● 校长著述

专访剑桥大学校长

柴 静

2012 年 08 月 05 日，视频：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598-39332.shtml

解说：在采访剑桥校长乐思哲先生之前，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段和他有关的视频。

字幕：2010 年 12 月 6 日，剑桥校园学生抗议当局提高大学学费

柴：您会感到紧张或者难堪吗？

校长：不，完全不会。因为这是学术界，在这里我们期待辩论，并鼓励大学里的思想自由。

柴：但更多的校长可能希望得到尊敬和服从，你不是吗？

校长：那他们就不会来剑桥。

（一组剑桥各种镜头）

解说：剑桥的创立，本来就不拘一格，甚至来自一场不顺从者的叛逃。

柴静串场：“撑一只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来到这里才会理解，为什么徐志摩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剑桥大学。因为这座有八百年历史的古老大学，就建立在剑河之上。但是，听船夫说法我们才知道，这所大学的起源居然与一桩凶杀案有关，在一二零九年，牛津大学的一名学生失手误伤了当地小镇的居民。在激怒之下，居民们冲进牛津以私刑处死了三位学生。有三位师生，出于逃避殴斗和向当局表示抗议，他们离开了牛津大学，来到像这样的荒芜之地，建起了剑桥，是它成就了今天这样一座，拥有八十九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著名大学。

解说：89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数字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座大学，它的内在是什么？在剑桥的两天采访里，我们对于大学的想象和概念好象一直在被一些细节颠覆，一本书，一棵树，一个人，一次晚餐，一场考试里，蕴涵着一所大学从八百年前创立之初的核心。

1、一棵树 An Apple Tree

这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棵苹果树了，当年它曾经种植在牛顿家乡肯特郡的后花园里，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就是被这棵树上的苹果砸中，开始思考万有引力之源。在六十年前剑桥把这棵树移植过来之后，就种在在三一学院的门口，来纪念这位剑桥历史上最伟大的学生。

解说：我们在树下站了很久，其实一棵苹果树的寿命只有一百年，这棵树最多也只是牛顿那棵树的后代吧。剑桥为什么要把它移植过来呢？我们问了几个路过的学生，有个男孩说，学校是想提醒学生，你不知道苹果何时掉落，科学研究需要灵光一显，但更多时候，需要漫长的等待。剑桥最

近的一位诺贝尔获奖者，是人称“试管婴儿之父”的罗伯特爱德华兹教授，在他成功之前，在长达14年里没有任何成果。

柴：您不觉得这个过程太漫长了吗？

校长：作为一个大学，剑桥带给学者最重要的财富之一，是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时间是关键因素，它能让学者从容地选择他们所想要研究的领域。而我们所说的空间，指的是让学者拥有如何支配研究时间的自由。

柴：但是谁能够来决定，他的研究是不是有价值的，是不是值得去等待的？

校长：这确实需要耐心。在一些领域，研究成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接受。例如，对于有些成果，科学家可能要等十四到十五年，才能发现它们的益处。而当我们想起哲学家，比如十九世纪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他的很多理论，直到今天才大放异彩。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柴：但如果他失败了呢？

校长：问题是你怎么定义失败。没获得诺贝尔奖并不意味着失败，他们也为学校的知识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而这体现在剑桥的崇高地位上。

（隐黑）

2、一本书 An Unique Book

解说：《夜间攀爬者》，是我们在剑桥随便一个小书摊上买的，据说绝大多数剑桥学生都读过。这本书详细指导了剑桥每一座标志性建筑该怎么爬上去，也记录了多年来剑桥学生在夜间攀爬中留下的传奇。

柴静串场：这里戒备森严，不向外界开放，被称为是剑桥的心脏，每年的毕业典礼都在这里进行，是剑桥最庄严神圣之地。但是就在一九五八年，某一个清晨，人们醒来从这里经过的时候。突然发现就在平一堂的楼顶上，斜放着一辆奥斯丁牌小汽车，没有人知道这辆车是怎么上去的，因为以当时的起重条件，不可能把一辆完整的车放上二十多米高的斜屋顶。就连救火队员想要把这辆车搬下来，也只好把它零打碎敲，全部变成一个个的零件，才从屋顶上卸了下来。

（空镜过渡）

串场2：这辆屋顶上的汽车一直是剑桥的传奇。不过这个故事中最打动我们的细节，还不是这几个学生怎么样把一辆汽车聪明地狡猾地巧妙地运上楼顶，挑战权威的。最打动我们的，是1958年其实学校就已经知道了那个事情是谁干的。可他们一直守口如瓶，保守这个秘密，也没有给这几个学生任何处分。只是由校长悄悄地给这几个男生一箱香槟。

解说：楼顶上的汽车早已不见踪影，但有些学生的杰作，却堂而皇之地高悬了百年。

拜伦：国王椅子腿

柴静串场：你看的这个雕像是国王亨利八世的塑像，在他的左手拿着一个金色的圆球，右手原

本应该握有权杖的地方，现在不知道被谁换成了一条桌子腿。这件事情不知道是哪年哪月和哪个人干的，相传是当年赛因学院的著名诗人拜伦所为，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无法可考了，但是有一个事情是确凿的。当年拜伦当学生的时候，因为反感学校的禁令不让在宿舍养猫养狗，他就在塔楼左边的阁楼上，养了一头熊。

柴：像剑桥这样庄严的地方，像亨利八世手里的那个桌子腿却一直没有换掉，为什么？

校长：我们鼓励学生争辩，鼓励他们挑战陈规。我们不愿意依靠地位的权威，而将观点强加于人，去束缚思想自由。

柴：但有的学校会认为说，学生这样挑战权威，会对他们越来越放纵，会变的很难去管理学生，你怎么看？

校长：放纵是一个错误的词，学生有权利表达反对意见，就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但这要有一个限度，他们的观点必须遵守学术界的规范。这毕竟是一个学术的社群，意味着我们必须能够容纳色彩斑斓、形状各异的不同观点。

解说：这次采访的时候，我们想请校长先生在此书上签名留念，不过他拒绝了我们。这不合适吧？我们找一本建校 800 周年纪念册签名吧？

解说：虽然拒绝签名，乐思哲校长私下跟我们说，那是一本好书。

（隐黑）

（现场冲突，和门卫解释，或用门卫阻挡的照片一组进）

解说：在剑桥著名的三一学院门口，我们吃了一次闭门羹。

3、一次闭门羹 A Cold Shoulder

柴静串场：我们希望能够进入剑桥的三一学院进行拍摄，但是刚才刚走入大门口，就被这位带礼帽的老先生给拦住了，他说，要想进去拍，要经过学院的允许，我们解释说我们来采访剑桥校长的，而且在学校里头的拍摄都经过了校方的允许，他坚持说我们在学院可不会听命于校方，在这条线之内，学院说了算。

解说：中国大学里学院都是附属于大学的，所以我们花了点时间才明白剑桥的学院能这么牛的原因。作为一个大学，剑桥其实更象一个联盟，整个大学由 31 个独立学院构成。这些“学院”看起来的主要功能似乎只是学生宿舍、食堂、教堂和图书馆，但实际上，每个学院都有独立的上至行政财务，下至招生教学的自主权。在我们拍摄时，三一学院拒绝让外人入院，也是因为已经进入考试季，担心学生受到打扰。象这样的每个学院的规定，就算校长亲自来，也无法改变。

柴：所以你不是这里的老板？

校长：在很多方面，在我们的观点里，我们更是一个学者。我们认为，一所学校不是由行政人员组成，而是由教职员工组成。我们认为这是剑桥学术繁荣的核心。

解说：学生在大学里上课，回到学院里，有专门的导师负责一对一的督学，他们也针对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对学生的发展负全责。

柴：为什么你要强调老师这个学生一对一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特别亲密的关系？

校长：这种一对一的互动对学生的个人发展很重要。作为一个学生，当他做一门功课的时候，他能被客观地评价，他们的观点能被客观地广泛探讨，从而激发出他们在各个领域的新想法。这种互动很难在三四百或是五百人的课堂里实现。我们试图去推广这样一个理念，学院制对每个学生的关注，是我们最为珍视的，我们相信这对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体验，也是他们所能受到的最好教育。

柴静：但是导师制太昂贵了，有人会说，“以做生意的角度来看的话，剑桥每招一个学生都是亏本的”？

校长：作为管理者，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要保证学校有稳定的资金，来实现这一切。我们非常支持本科教育，因为我们坚信剑桥独一无二的本科生教学方式。是的，这很昂贵，但我们将利用一切资源，来确保实现它。

解说：直到受一个学生邀请，我们才有机会进入 1496 年成立的耶稣学院，去感受学院内部的古老传统。

4、一次晚宴 A Formal Dinner

柴静串场：今晚七点半,我们会在 Jesus 学院，他们一个正式的餐厅，跟学生和老师们一起晚宴。这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所以要求每个人一定要穿这样的长袍。现在钟声已经响了，你必须进去。

柴静串场：这个就是我们今晚的晚餐，一个鸡块，和有一些水煮的萝卜和青菜。看起来座位不是很大，不过你看看这个用餐的地方，也会像我们一样想起，哈利波特当中的魔法学校。这就是八百年历史当中，剑桥的传统。在这个正式的晚餐上，只有教授和学者可以坐在最上面的高台之上，下面的这个长条桌是学生坐的地方。当教授们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每一个人必须起立，像他们致敬。而且跟随他们一起念完拉丁文的晚祷文之后，才可以坐下来用餐。当九点钟，教授跟学者离开这个房间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始拍摄。那一瞬间，确实很多的学生站起来开始欢呼和鼓掌，重获自由。可是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所有人站起来，送这些教授出门的时候，拉开椅子那一瞬间的寂静。会让我们想起来身边这个剑桥的博士说的话，他说，有的时候，剑桥的庄严会在一瞬间秒杀所有年轻的叛逆。

（剑桥空镜 学生状态 人流 音乐 学生紧张备考 过渡）

解说：我们在剑桥的时候正是期末考试阶段，以往熙攘的大草坪此刻只有备考学生匆匆而过的身影。在耶稣学院门口，我们正好碰到几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告诉我们，剑桥的考试卷子里，从来没有选择题。

（采访中国留学生）

柴：什么意思？

男：如果是理科的话，要么就是计算的大题，要么就是一些概念性的讨论。但文科基本上就是论文，大段的论述。基本上没有简单的 ABCD 的选择题。

柴：那岂不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男：对，应该是没有一个标准性答案，就是看考官会怎么看。

柴：听起来有些学生就觉得那不是很好混吗，就是出几个大的论述题，然后论述一下就过去了，你们感觉怎么样？

男：还是比较难。这边的考试并不是严格的分数系统，只有前 25% 可以拿到一等的学位。来到这里很多人都是很聪明很聪明的，很努力很努力的。所以要挤到前 25% 并不是那么容易。

男+女：相对的比例，绝对的成绩。

柴：剑桥的学生考试几乎没有选择题，大部分是开放式的提问。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

校长：如果你只考封闭式的问题，只需回答是或否，那么只会让考试变成死记硬背的记忆测试。我们想做的，远不只是记忆测试，我们更希望知道学生怎么想，怎么建构自己的想法。

柴：你们希望剑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

校长：一个理想的学生应该拥有极高的学术天分和刻苦学习的潜能。同时，他必须独立，并且在学术上有自由思考的能力。他要有志向，去不遗余力地鞭策自己，同时具有改变世界的壮志雄心。

5、一座花园 A Botanical Garden

（剑桥各种建筑的延时光影变化）

解说：这条小路，是当年的剑桥学生达尔文最喜欢的地方。漫步在这里，我们忍不住会想，如果没有剑桥培养学生的这种开放心态，发现人类物种起源的达尔文没准只能是一个牧师吧。

柴静植物园串场：作为剑桥学神学的学生，达尔文的日子过得可不怎么样。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又懒又不信上帝，所求唯一的就考试及格，这种情况一直到他认识了在剑桥公开课上的教授，植物学教授汉斯洛，汉斯洛在一八三二年把这片原来是麦地的地方改造成了赛因学院的植物园，在这他教给达尔文怎么去认识天竺葵、忍冬花、甲壳虫和土壤。而且在之后，推荐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开始他人生中第一次环球之旅，这位植物学教授，把一个迷茫的本科生，推上了人生的决定性道路。

解说：剑桥的动物学博物馆，至今还收藏着 180 年前达尔文第一次环球航行中寄回学校的很多动物标本。航行中，达尔文一直在做切片和研究，每到一个口岸，就把标本寄回给身在剑桥的老师汉斯洛。达尔文屡次在信中提起物种也许是梯级进化的念头，这在当时是亵渎宗教的言论，但他得到的是继续探索的鼓励。1835 年，达尔文航行到厄瓜多尔群岛，看到了一些大小迥异，但却有极

强相似性的鸟类。

柴静串场：他写封信给汉斯洛说，也许我们犯了杀头的罪。因为他真的相信，动物是可以进化的。就是这个念头，改变了达尔文的一生，和整个人类对于物种起源的看法。

（隐黑）

6、一次错认 A Wrong Person

（纪实：剑河上，认错了霍金）

解说：在剑河上泛舟时，桥上的一个坐在轮椅上身影让我们激动了一下。调转船头，追至近处，才发现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人，而河上的游客都象我们一样将他误认为霍金，因人人都渴望见到这位坐在椅上的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来剑桥前，我们曾数次尝试联系他，但得知他身体欠佳，一直在家养病，很少出门会客。我们也去他工作的地方尝试过。

解说：这个热心的意大利人，是霍金教授的同事，当他知道了我们的想法，他乐了，他说他来这工作已经五年，也只见过霍金教授两回。

（霍金照片一组）

串场：这是剑桥新的数学中心，在几年前刚刚新建起来，花了六千万英镑，大概相当于六亿人民币。而其中一半，由社会各界捐献给在这里工作的斯蒂芬霍金，也就是继爱因斯坦后最杰出的科学思想家的。不过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当霍金身染重病，被禁锢在轮椅上，只有三根手指能够活动并逐渐丧失语言能力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会做什么。医生甚至预言他将在两年之后死亡。但是两年后，就是他二十三岁的时候，剑桥聘用他成为本校的教授。

柴：霍金教授 21 岁时他已经得了很重的病，那个时候你们不知道他会创造出什么，在其他学校，他可能会被选择离开，那剑桥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校长：这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大脑，被禁锢在了一个虚弱的身体里，这是我们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因为说到底，这所大学最看重的，是他的大脑所将创造的价值。

柴：但是如果他没有获得后来的这些成就，它能得到学校同样对待吗？

校长：我们的选择永远取决于一个人的潜力。无论他是学生，还是学校员工。

柴：但是潜力这个词听上去很抽象？

校长：它很抽象，但也是一个很主观的现象。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越客观越好，有时候你要相信你的判断。

柴：但有人可能会说人的判断会出错，可论文的数字不会出错？

校长：我们更倾向于个人的判断而不是论文的数量。因为论文的数量会因学科而异。例如我们的学科，免疫学，我们发表了很多论文，而哲学家可能一生只写一本书，但这一本书所创造的价值，也许比五百篇免疫学论文还大得多。

柴：但我们想那些需要论文数目的行政管理人员可能他们希望会说，我们说了算。

校长：我们不玩数字游戏，我们认为这是对大学本质的滥用。因为最终，为学子授课的不是行政管理人员，而是教授和讲师们，是他们让年轻人被睿智的思想所感召。剑桥的独立思考精神能让年轻人创造出足以改变世界游戏规则的伟大成就，不管是什么专业。我们坚信，这就是为什么剑桥的学生和老师会在世界上脱颖而出的原因，而且最终会将这种品质与卓越在未来传递下去。

柴静串场：在剑桥，这只钟被叫做“吃时间的虫子”。因为在它的顶端有一只凶猛的蚱蜢，每一分钟的第一秒它张开嘴，最后一秒闭上，吞吃时间。这个钟的钟摆是西方的棺材，每到一点钟的时候，它就会重重的一响，来提示人们，距离死亡又进了一步。这个残酷而真实的钟当中蕴含着剑桥的校训，那是苏格拉底的一句拉丁语，他说“我们与世界相遇，我们与世界相蚀，我们必不辱使命，得以与众生相遇。”一个人的一生，非常短暂和脆弱，容易被时间侵蚀。但一所大学，仍然有希望帮助这个人，去实现他认识世界，探索自身的全部征程。

解说：一本书，一棵树，一个人，一次晚餐，一场考试……剑桥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在于他拥有的杰出的人类头脑，从牛顿，达尔文，到霍金，这所大学对这些头脑珍重、爱惜。人们寻求知识，是为了寻求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尊重一切能够达成人类进步的方法，常识和规律，这就是剑桥的灵魂。

（柴静博客）

希伯来大学副校长阿肯：科学家是创新的灵魂

欣闻希伯来大学副校长阿肯教授受邀将参加 11 月份在深圳召开的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科技日报记者与其联系，就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国科技学术交流、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等主题进行专访。在 9 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阿肯在其位于希伯来大学吉瓦特拉姆校区宽敞的办公室接受了采访。这位不惑之年便已蜚声国际的生物化学家儒雅而睿智、深刻但不失和蔼。他 2009 年被任命为这所以色列最高学府的副校长，主管研发部门，该部门承担着管理研究资金、帮助科学家获得资助、发起建立新的研究中心并促进与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交流的任务。

记者：希伯来大学是以色列首屈一指的大学，不但是以色列人才的摇篮，还是科研创新的基地，你能介绍有关情况吗？

阿肯：希伯来大学是以色列最著名的综合性研究性大学，2011 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第 57 位（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院 2011 年发布），今年又被《科学家》杂志开展的第 10 届学术界最佳工作地

点调查评为美国以外学术界第二佳工作地点。希伯来大学承担了以色列近 40% 的民用科学研究任务，培养了以色列 30% 的博士生，开展的 3800 多项科研项目中 16% 的成果应用在高科技领域。大学的全资子公司——YISSUM 技术转化公司在过去的 47 年里获得了超过 530 项技术许可，商业化成功的产品每年产生超过 200 亿美元的销售额。

记者：以色列是典型的创新型国家，科技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希伯来大学是以色列最著名的研究性大学和科研基地，国际合作非常活跃，你能介绍希伯来大学与中国合作的情况吗？

阿肯：我首先强调与中国的合作是我们战略规划中的最高策略。目前有一些中国博士后学生在希伯来大学学习数学、化学、物理、农业、医学等，我们在瑞号沃特的农学院来自中国的学生要多一点，我们的国际学院正在加紧招收中国学生。我们和中国的著名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如北京大学。今年他们派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代表团来我校访问，会见了校长，谈了合作事宜等，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还要将目光投向东方，来加强我们已经所做的事情。我们计划招收更多的中国学生，增加参与合作研究项目的中国学生。目前我们正在寻求一种机制来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来实现目标，比如像贵报这样的中国主流媒体。

对于交换生项目，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学生，主要是博士学位以上学生。我们所有的博士课程有英语教学、学生研讨会，他们有广泛的选择，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项目，有一些来自中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其中，但我们期待更多。

记者：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科技立国路线，科技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就你所知，你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有什么样的评价？

阿肯：中国科技发展令人惊讶，中国科技已经变成一支国际上的重要力量。如果看看 10 年前，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中国人屈指可数，可现在每期都有中国人的文章，中国已经变成一支主导力量。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希望加强与中国合作的原因，科学不同于政治，我们不在乎谁给出了答案，我只想知道哪里有神奇的事情发生，过去只是在美国、欧洲，但现在焦点转向了东方，所以我要去中国。

记者：中国今年 7 月举行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了到 2020 年将国家初步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并颁布了《“十二五”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设定了 7 大重点发展领域和 20 个重大专项工程，你对中国的这一战略有什么评价？你对如何制定实施好科技发展战略有什么建议？

阿肯：我的答案可能有点惊奇，但也很简单：关注人，找到最好的科学家，给他们资源！别太局限于一些特定的领域，如脑科学研究、人工神经网络研究，某个领域当今也许非常重要，但 10 年后呢？也许不重要，谁知道呢？但是如果你支持、投资非常好的科学家，他们将会做非常出色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的工作主要是鉴别发现最好的科学家，并给他最大的支持，然后静待奇迹发生。有一个好例子，让我们看看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科学慈善组织，美国的霍华德 休斯医学研究所

和英国的维康信托基金会，他们每年都拿出数十亿美元资助科学研究。维康信托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研究人人都是可以争取，但霍华德 休斯医学研究所与它不同，它资助美国最好的上百位科学家，并给每位科学家资助百万美元以上，让科学家在各自的领域中去探索和奋斗。我认为霍华德 休斯医学研究所做得更好。

我认为，制定一个 5 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计划固然好，但最好的选择是，发现最好的科学家，给他资金，然后看他们的想象力能把他们带向何方。因为你永远无法知道想象力将把他们带向何方，科学家是所有创新活动的灵魂。

科技日报 2012-9-28

中国人大校长陈雨露：校庆应回归大学育人本职

10 月 3 日，中国人民大学迎来了 75 周年校庆日。今年校庆，中国人民大学却办得与以往不同：传统校庆的庆祝大会取消了，变成了公益校庆。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说，这样一个理念的变化，是想让校庆充分体现学生和学术是大学的原点，育人是大学的本职，我们将要倡导推动实现一个回归大学本位的校庆。

关于“公益校庆”

公益育人培养学生爱人之心

新京报：办校庆对校长而言，应该很累吧？

陈雨露：这次校庆，作为校长来讲，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得到了解放。

新京报：为什么？

陈雨露：原来的校庆模式，校长需要去做原创，同时校长还要去做全校的动员，校长还要去邀请各路的贵宾，是非常累的。

这次校庆，因为创意来自于师生和校友，组织也是在校学生为主，同时邀请人回来也是由在校学生一对一邀请。校长核心的作用是做一个推手，我要做的就是，发现亮点，提升亮点，助推新的校庆模式在同学为主体中达到最佳的效果。

新京报：人大校庆亮点之一是“公益校庆”，如何确定这一理念？

陈雨露：公益校庆理念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于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一个是来源于同学自己。

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个共同的元素，就是在育人的过程中要公益育人，培养学生的公益心，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的爱人之心。“公益”理念也从同学身上受到很大启发。我们对独生子女这代人可能有一种过分的低估。我们都相信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有善良的种子，而大学要做的，就是把这颗善良的种子上升到理性的层面，上升到精神价值的层面。

新京报：学生做了哪些“公益”的事情让学校很受启发？

陈雨露：第一他们主动提出来，能不能通过义卖的形式，把关爱师生基金规模扩大，我们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就上升到学校层面。现在基金规模由几十万扩大到近千万。

第二，学生自己的社团组织里也开展了很多公益性活动，比如他们参与造血干细胞的采集，现在已有几百名学生进入了中华骨髓库。

第三，在校庆中，学校鼓励和支持每位在校同学去做公益。响应的人也越来越多。凡是参与公益校庆系列活动的同学，我觉得“公益”的理念对他们的影响都是深入骨髓的。

新京报：大学在“公益”方面哪些还做得不够？

陈雨露：第一，把学校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最大的公益。教授要像教授，学生要像学生，校长要像校长，都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

第二，在办教育过程中，老师和学生共同的任务是把学生从“小我”变成“大我”，这比传授知识的作用更大。要让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有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第三方面，从教育本身来讲，在办学过程中对“公益”还提得不够。“公益”是一面旗帜，要把公益的旗帜举得高高的。

新京报：“公益校庆”活动之一是在京举行了“百场社区公益讲座”，参与的知名学者是怎么确定下来的？

陈雨露：今年是校庆年，这种公益讲座更集中一些。

这些活动实际上是我们应该做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做得不太好，现在要尽快把这个传统恢复了，谈不上什么创新。学者的确定既有自己报名的，也有校庆办公室学术组邀请的，二者都有。

关于“不办庆祝大会”，不是请不到领导找不到场地

新京报：有的学校校庆甚至到人民大会堂去开庆祝大会。

陈雨露：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让整个社会对教育有充分的关注和支持，包括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支持，通过校庆让社会各界看到教育的重要性，利用校庆的机会让更多的领导能来到校园，希望能得到领导的支持。这种情况下，过去的校庆模式都是围绕庆典大会为核心的。

现在要看到很多兄弟院校的校庆都在转型，我们坚信，大家再办校庆时都会与时俱进的。

新京报：人民大学今年为什么不办庆典大会？

陈雨露：提出校庆的新理念，就是倡导尽快地回归大学本位，大学的原点是学生和学术，大学

的本职是教书育人。

作为人民大学来讲，我们还要办校庆，还比较看重校庆在转变理念方面的冲击力，通过校庆来让大家受到教育。

新京报：不办校庆大会，是不是因为请不到领导，或者找不到场地？

陈雨露：都不是。每个时代的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和重视人民大学，都先后来到人民大学，所以不存在你所讲的这个问题。新世纪以来人大校园建设也有很大改善，更不存在找不到场地的问题。

越是重要的大学越要发挥引领和示范的效应，我们努力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希望我们自己从学校领导到教职员工能尽快地形成共识，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新京报：不办庆祝大会会减少一些花销吗？

陈雨露：因为不再举行庆祝大会，所以费用就少了很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完成一个全部由校友和社会捐赠经费的校庆。这仍然有很大的压力，目前完成 70%左右，有 30%左右，我们还是要努力。既然我们有承诺，我们就必须做到。

关于“培养人才”，以“厚重”为灵魂培养杰出人才

新京报：有人主张校庆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对过去历史的反思。为什么人大校庆提出的是“引领明天的聚会”？

陈雨露：现在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大学怎么能够缔造出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杰出人才，这是国家急需高等教育特别是重点大学要做的。

人民大学必须要尽快破这个题，找到路径来缔造这样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巨大的命题，所以需要巨大的努力。

新京报：这个路线图如何描述？

陈雨露：现在已经明确了这个路线图的灵魂——厚重，这方面形成了高度的共识。找到这样一个关键词之后，接下来的路线图就有了灵魂。就不会走弯路，所设计的育人的各个环节都有逻辑。

新京报：如何理解“厚重”？

陈雨露：我们理解的“厚重”有四个方面的内涵：第一，要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要有科学精神，要有跨文化的沟通能力。

第二，要有哲学功力和建设性思维，大学教育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理工农医，哲学学好是成才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方法论很重要，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同时不能只批判而没有建设性。

第三是要有政治上的追求和理想的坚持能力。

第四，要有体育精神，坚强的意志品质和团结合作的能力。

之所以能形成共识，是因为这符合人成才的规律，人有多么厚重就能走多么高多么远，也符合

人民大学的校风和学风。

关于“校友评选”，部级校友主动不参加

新京报：“令我自豪的人大校友”评选活动不把党政机关在职领导干部作为候选人。可一般人看来，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可是杰出校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刻意不把他们列为候选人呢？

陈雨露：实际上我们是应这些校友的要求而提出的。

人大这次校庆的很多校友，很多在党政机关工作的领导同志就主动提出，我们就不在这里头了。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以人民冠名的大学，实际上校友要多反映在一线工作的同志，这也算是带个头儿吧。

这些党政机关的校友也确实在各条战线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也算是他们的一种姿态，另外也代表着一种好的和新的理念，应当更多地反映在基层，在一线，在市场发展的前沿的校友们。

新京报：这些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主要是指部级以上的呢，还是司局级以上的呢？

陈雨露：主要是部级领导们。

新京报：你现在是副部级高校里最年轻的校长，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可以分享？

陈雨露：我出生于 1966 年，我的属相是马，我经常说，担任人民大学这样一所神圣的名校校长是名副其实的“小马拉大车”。所以我非常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感谢学校师生给我的支持和鼓励。

1989 年工作以来，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一个人一定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那就能够事半功倍。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虽然辛苦，得到的其实更多。

提出公益校庆的新理念，就是倡导尽快地回归大学本位，大学的原点是学生和学术，大学的本职是教书育人

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个共同的元素，就是在育人的过程中要公益育人，培养学生的公益心，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的爱人之心。

新京报 2012-10-2

“根叔”谈华科大未来：让学术自由成为永恒追求

“追溯当年，学校受‘左’的思潮影响，曾经使某些青年才俊离校而去；曾几何时，也有过对学术

不端行为的容忍；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少了一点实事求是；学校对‘人’的关注也时有不够。这里，借此机会向师生员工、离退休人员、校友，并向社会表示我们的歉意！”昨天上午，在华中科技大学建校 60 周年庆祝大会上，该校校长李培根院士在致辞中向在场的 4000 多名师生和校友鞠躬致歉，获得现场热烈的掌声。

“科研走在教学前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科学技术，一打就垮；没有人文精神，不打自垮”，“让医学归于大众”，在致辞中，“根叔”引用了华科大前校长朱九思、杨叔子和校友裘法祖的名言，并列举为吸血虫病防治工作献出生命的魏德祥、亲手将大气水资源建议交到胡总书记手中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段正澄、“小处方医生”王争艳、从事环卫工作的毕业生占美丽、自创公司并在纽约上市的 80 后校友汪海兵等杰出师生代表以及“华中数控”等科研成果，展示出华科大求是创新的精神，敢于竞争的豪情和善于转化的智慧。

“根叔”自豪地表示：“你可曾想象我们的大学生站在中央电视台的晚会舞台与知名主持人同台主持节目；你或许已经知道我们毕业不久的一个学生的歌声成了‘中国好声音’！这一切都说明——华科大的教育正在变得生动起来。”

“只有回首以往，我们才知道自己已经走出多远；只有反思过去，我们才知道自己还能够走多远。我们不要只沉湎于历史的辉煌。大学作为理性的堡垒，更需要反思。唯如此，大学才更有生命力。”回顾了 60 年的办学成绩，“根叔”突然话锋一转，郑重地向到场师生和校友鞠躬致歉并反思“未来的华科大还需要什么？”“未来的华科大，要常怀教育者的良心；要赋予自己更大的担当；要让‘学术自由’、‘让学生自由发展’成为永恒的追求。”“根叔”特别强调：华科大要保持和彰显自己的特色，更要在社会功利的喧嚣和躁动中保持冷静和清醒。“我们也不必用特色裹满全身，否则我们恐怕只剩下色彩，最终也丢失了自己。让我们共同努力，使华中科技大学成为大写的她自己。”

“从李校长时长近 20 分钟的讲话中，我听到了国内一流大学校长的责任和担当。”一位从上海返校参加庆典的校友表示，“根叔”的讲话情真意切，富于自我批判精神，令人印象深刻。（见习记者 李晗 通讯员 王潇潇）

武汉晚报 2012 年 10 月 07 日

● 专家观点

纪念钱伟长诞辰百年：放弃科研办教育是值得的

两年前，许丹丹刚刚研究生毕业，那年的夏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档采访钱伟长先生的节目。钱老的一句话让她印象深刻：“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在她眼里，钱老是一位爱国者，是一位科学巨匠。

两年后，许丹丹已经成为钱伟长曾经工作学习 44 年的清华大学的一名博士生，所学专业也恰为钱老所从事的力学研究。不久前，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纪念钱伟长先生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许丹丹在钱伟长的同事、亲属的叙述中，又发现了他的另一重身份。

教学可惠及全国

“办教育值得吗？”

“值得！”

这段对话来自钱伟长和他的儿子钱元凯。彼时，已是古稀老人的钱伟长，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身给了大学教育。钱元凯问他：“作为一个学者你停止了自己的研究，每天陷入办学的繁杂事务里值得吗？”钱伟长毫不犹豫地说：“科研项目可以惠及一个学科，教学少则为国家培养成千上万的人，多则成功经验可以惠及全国，值得！”

钱伟长的教育生涯是从上世纪 50 年代，他担任清华教务长开始的。此后，他的一生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教学里。钱元凯回忆，早在上世纪中后期，钱伟长便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明确提出了反对理、工分校，反对全面学习苏联教学体制的主张，并特别强调要重基础教育，反对片面地强调专业教育。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根本谈不上“叛逆”，但在当时却超越了很多人的认识水平。

“钱先生在中国时，接受了最好的文化教育，跟钱穆等大家都有密切交往。而在加拿大、美国留学期间，又能够跟爱因斯坦等世界一流学者共同工作，因此，他提出了很多独特的理念，在当时不仅不被大家所接受，还由于政治形势的原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到现在又大多成为大家的共识。”在座谈会上，上海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这样说。

分析、解决问题并不全面

1983 年，经邓小平同志任命，钱伟长来到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在这里，他终于可以将自己的治学理念付诸行动。

“在学校办学方针上，钱校长在 80 年代就提出要办研究型大学，但是他提出办研究型大学跟现在有些学校在排行榜上争一流研究型大学有本质区别，因为他提出的是从培养学生培养人才的角

度。”周哲玮说，钱老认为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需要的是创新型人才，而没有创新能力的教师是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的。所以，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要办研究型的大学。

而在对学生培养的目标设定上，钱伟长也有着自己的理念。

“钱先生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合格标准有自己的说法。”周哲玮说，一个合格的本科生应对已经成熟并得到系统总结的知识做到无师自通；一个合格的硕士毕业生，则应该懂得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包括文献调查、社会调查、现场调查；等到了博士阶段，就是应该在导师的指导下，能够自主地提出最值得研究的课题。

“总的来说，钱先生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我们传统的提法则主要强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钱先生曾经说过，这一观念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完整的。对此，我们是否该有所思考呢？”周哲玮说。

最好的学生是问题最多的学生

当然，作为一位学术大家，钱伟长在从事教学管理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科研工作。“文革”结束后，曾蒙受不公平待遇的钱伟长终于可以放手工作了，他迎来了自己科研上井喷式的发展。据钱元凯回忆，在那几年中，钱伟长所撰写的科技论文达到了 120 万字以上，他曾经兴奋地表示，可以做的题目太多了，可以放手大干。

事实上，在科学研究的问题上，钱伟长同样没有忘记从一个教育者的角度对其作一番阐释。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他就曾针对我国科技工作者的任务写过一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提出来“什么叫科学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

“钱先生说，很多人认为我们需要出一个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出一个像相对论这样的成果，才叫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他不这么看。”周哲玮表示，在钱先生看来，如果若干年以后，针对我国社会和文化建设中所提出的科学问题，我们可以基本仰仗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而不依赖于外国人的话，就可以说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这完全是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来评价我们的科学。也反映了钱先生的教育理念，那就是始终主张创新，而始终不被条件所限制。”周哲玮说，这就要求今天的年轻学子们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去努力，去创新。“钱先生多次讲过，最好的学生就是那些毕业以后脑子里有最多问题的学生。我们今天的大学生能够在毕业之后，用自己的质疑，用自己的创新，去完成老一辈科学家的愿望吗？”

中国科学报 2012-10-10

杨福家院士：中国高等教育须力戒浮躁

中国的大学为什么难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关键反映在学生的水平上。一流大学一定是将育人放在第一位的，育人第一、学业第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如是说。

近日，杨福家应重庆市科协之邀，参加“2012年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并接受媒体专访。这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2001年起担任世界知名高等学府——英国诺丁汉大学第6任校长。

帮学生发现“火种”

长期以来，中国的大学招生一直将学生分为一本、二本、三本。对此，杨福家认为这会人为地造成学生自卑，违背教育规律，不利于育人。因为，“同学的差异不在分数，而在头脑中的火种不一样，而发现火种不容易，有一个过程”。

什么是火种？杨福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家庭有两个女儿，妹妹考进了全国有名的医学院，家里都引以为荣。姐姐只考了个专科，被家人看不起，但她酷爱园林设计并坚持梦想。一个偶然机会，姐姐的丈夫出国访学，她去陪读学起了服装设计。酷爱园林设计，怎么学了服装设计？自信且有独到见解的她说：“都是设计呀！只不过一个是在地上画图，一个在面料上画图而已。”

毕业后，姐姐被一家很大的设计公司看中了，从事的却是建筑设计工作，但一年后就“腾飞”了。她的灵感与专业水平让开发商折服，在业界影响很大，后来还拿到了美国很难取得的建筑师执照。“这就是她的‘火种’被点燃的效果。”杨福家说。

这样的“火种”又该怎样发现呢？杨福家希望所有大学都重视第二课堂，给学生实践机会。“当有人问耶鲁大学校长为何该校能产生那么多总统时，他回答说：我们有250个社团，就有250个小的领袖，这些小领袖以后都有机会成为大的领袖。”这样的回答值得我们思考。

杨福家当复旦大学校长时，第一句话说的就是：给年轻人更多机会。他希望大学要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也希望大学生要抓住机会。在目前他兼任校长的宁波诺丁汉大学，第二课堂就被广泛开展，且都是小班教学。

一流不在速度，而在学生水平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有一次在重庆考察时，曾经为一所中学题词：宁拙毋巧。他解释说，这“拙”，就是要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因为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这“巧”，就是投机取巧，面对多元化的选择，抵挡不住诱惑，心生浮躁。

杨福家在谈到中国教育的问题时则用了四个字：力戒浮躁。

他直言，中国大学扩招有其积极的一面，但错在结构不合理。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就不该盲目扩招，应保持高标准的门槛，确保招到真正的研究型人才。以职业教育为主的高校才该扩招，发达国家的职业学校发展都很好。

“盲目建大楼、建大学城，是又一个浮躁的表现。”杨福家说，“一流不在大楼，不在速度，而在你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水平。”他强调，在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始终都是第一位的，科学研究则在其次；大学要办好，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育人，教师要与学生亲密无间，要重视课堂交流，“但现在国内高校普遍是论文第一，而非育人第一。一流教授在干啥？在作研究。当年我在复旦被破格提为教授时，苏步青老校长就提醒我：你是教授，该去上课！”

除了上课，老师还必须和学生打成一片。杨福家在多种场合说，国内很多高校在学习世界一流高校的经验时，得到更多的还是皮毛而非实质。“欧美高校本科教育的精华在于‘住宿学院’。有一批知名教授住在里面，担当学生的导师，而首席导师应该是德高望重的权威学者，他们是‘又高又大的人’。”杨福家引用耶鲁大学校长 Richard Levin 的话说：“耶鲁的王牌就是住宿学院。”

学术不端，怎么处理都不过分

弄虚作假、行为失范、剽窃抄袭等严重违背科学精神和道德的学术不端行为，正在中国高校蔓延，严重损害学术形象，败坏社会风气。对此，杨福家深恶痛绝，用他的话说就是：怎么处理都不过分。

在接受采访时，杨福家不点名谈到了今年7月发生在国内的“教授造假案”。对这种行为被查核实后只给予开除处分的做法，他认为“很不够，应该剥夺其在中国所有大学任教的权利”。理由很简单，一个弄虚作假、连最起码的诚信都不要的人，还配做老师吗？

“诚信是教育的头等大事，只有用最严厉的处罚，才能治理好学风。”杨福家无论是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在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中，都用大量例子来证明国外高校对学术诚信和尊重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美国波士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一堂课的最后用一句很有文采的话作为结语。谁知一同学下课后向院长反映，这句话出自他人并非教授原创，而教授并没有表明出处。教授得知此事后，当即辞职，当地媒体也报道了此事。“这在中国，会被人认为是小菜一碟、小题大做，但在国外却是很严重的大事。”杨福家说。

一流大学应将育人放在第一位，育人则要以诚信为本。杨福家认为，我们培养的人不仅要在专业上非常出色，而且要具备全面的知识，拥有高尚的道德，这样才能成为社会的领军人物。他在做复旦大学校长时，就采取了非常有力的措施来制止剽窃，严惩作弊。他说：“谁作弊，就退学；上午作弊，下午退学。无须校长审批。”据报道，他一上任校长，20个作弊的学生都退学了。因为在他看来：追求真理，诚信为本。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10-10

熊丙奇：南科大不要成为“舌尖上的南科大”

2010年，朱清时校长在给学生和家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一步到位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2011年，援助南科大的三名港科大的教授“出走”，朱清时校长也调整了南科大的定位，他说：“要把南科大办成加州理工大学一样的创新研究型高校。”而最近，朱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如果说远景的期望，我希望南科大要像斯坦福大学那样，不仅是高新技术的研究者，还要成为深圳市、广东省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新京报》9月21日）

作为一所新创立的大学，在建校之初“摸索”学校的办学定位，这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对于南科大来说，不管是最初想“模仿”港科大，还是后来想成为“加州理工”和“斯坦福”，如果没有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想都不要想。对于国外和境外大学，我国大学需要借鉴，但“拿来”的不是学校的外在，而应该是最基本的办学制度。

早在2007年，深圳市就提出将要主要借鉴香港科技大学成功的办学经验，力争通过15年左右的努力，建设成为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这一提法，一直延续到2011年年初。深圳之所以选择港科大作为借鉴对象，一来地理距离近，二来港科大的快速崛起，符合国人对快速办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期待。本来，如果深圳能全力借鉴港科大的现代大学制度，排除阻力在南科大“落地”，南科大后来的诸多“风波”，基本上都不会发生——首先，深圳可借鉴香港当初举办港科大制订大学章程的模式，制订南科大的章程，明晰政府、学校的权责界限；其次，按照大学章程，组建代表广泛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的重大战略决策，包括公开遴选校长、确定学校的发展定位等；再次，赋予学校充分的办学权力，推进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

可是，这些都没有发生，所以南科大的“风波”就出现了。其实，深圳在南科大宣布筹建时，是有按照上述路径建立南科大的打算的，当地政府官员曾公开表态，要通过深圳人大立法制订南科大章程，可这到现在还没有成为现实。只是在去年年中，出台了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由于没有南科大章程，南科大校长的公开遴选，本质还是政府部门主导；南科大的首届理事会，所有理事全部由政府委任；于是，南科大根本没有办学自主权。由于南科大在现代大学制度方面的探索不力，所以，借鉴港科大注定无疾而终。

在这种情况下，南科大再提出借鉴其他国外大学的办学模式，就更像是“口号”了。而通过这些几乎一年一变的“口号”，公众甚至可以感受到朱清时校长的无奈，和南科大被加速“体制化”。一方面，这些口号给人的感觉是，朱校长是说给深圳市政府听的，尤其是新近的提法“不仅是高新技术的研究者，还要成为深圳市、广东省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从办学角度说，一个学校要办

出特色，首先必须保持独立性，过多地考虑社会经济利益，很可能让大学陷入功利。近年来，斯坦福大学也开始反思，不少人认为学校不注重通识教育，商业味太浓。虽然朱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对于今年的招生，教育部没有过多干预，但他也一再提到“主要困难是在国内现有体制之下，我们要作的改革遇到了很多障碍”。

另一方面，把大学办成东方的（中国的）某某大学，一直以来是我国政府官员、学校领导经常挂在嘴边的目标，诸如东方的哈佛、MIT 等等。在本世纪初，我国不少大学，都列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还有的大学，就完全按照国外大学的“外形”进行建设。比如，在大学旁边搞一个科技园，欲打造中国的“硅谷”、“128 公路”；在学校内部，也比照相关大学设置学科。但是，这只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形似”，而不是“神似”。

只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才可能让大学有自身明确的定位，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经验之谈。我国大学发展的难点，就在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政府部门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学校的方式，把办学自主权真正交给大学。

可以说，在这方面，深圳以及我国其他各级政府部门，并没有作好准备。依照现代大学制度，公办学校将真正成为“公立学校”，政府负有投入的责任，可是却不能直接参与办学，不能直接任命校长，而必须通过大学理事会公开遴选；不得直接指挥学校设置什么学科、专业，这是属于学校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如果政府部门不作上述转变，我国大学的办学不会出现突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可能是“口号”以及“舌尖功夫”。

中国科学报 2012-10-10